

西南大学记忆

◆名师风采

我的父亲侯光炯（上）

改革开放，造就激情燃烧的岁月

◆档案拾遗

校档中的侯光炯

反右派运动中“右派”言论及

“整风”史料选登

◆校史校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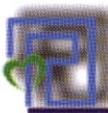
晏阳初与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西南大学寻根（之二）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09年第2期
(总第3期)



显兰同志并转

学校党委各位领导同志：

我从56入党到现在已经34年了，我长期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教育和培养，却没有一点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成绩来报答党，感到非常惭愧，更加使我难过的是，我负有培养青年的重大责任，但却苦于缺少一个始终追随我、完全掌握我的学术思想，能够继承我没有完成的学术研究的同志，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此我决心从今年元月1日起，每月交纳党费200元，作为身后培养优秀青年的奖励基金。我理想中的优秀青年的标准是，在学术上能日以继夜地改革创新，并使之转化为生产力；在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方面，则希望他走焦裕禄同志和白求恩同志式的真正有献身精神的人。

目前我虽然已经85岁，但还决心在最后一息到来之前，继续日日夜夜地刻苦钻研，并走入农民群众之中，和青年们一起，为土壤诊断方法，为农业生产创造出自然免耕凸免凹高，大小三化的新格局。请学校党委严格地监督我，教导我。

此致

崇高的敬礼

侯光炯

1990年元月17日

于相岭

1990年侯光炯写给当时院党总支书记付显兰及学校党委的信

侯光炯决定从1990年1月开始，每月交纳200元党费（当时他每月工资为505元），作为身后培养优秀青年的奖励基金。1992年，他获四川省委、省政府科技重奖10万元，也用于科研和奖励基金。

（资料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

刊首语

我们享受党和国家的东西越多，欠人民的就越多。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对得起人民。

——侯光炯



主办: 档案馆
西南大学 校史研究室

顾 问: 张跃光 丁忠民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 袁隆平

主 编: 潘 洵

执行主编: 蒋 涛

副 主 编: 胡小京

执行编辑: 李亚勍

编 委:(按姓氏排序)

郝 龙 洪秋冰 刘广生

刘沐璠 田朋朋 王 娜

韦 俊

美 编: 侯艳梅

校训:



刊首语 侯光炯

工作动态

- 4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档案事业
更好地科学发展并为科学发展服务
——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上) 杨冬权
- 10 关于公布各单位档案工作分管领导和
兼职档案员的通知

名师风采

- 13 我的父亲侯光炯(上) 侯啸培
- 18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恩师待我情
——追忆侯光炯教授 江育璋
- 26 七律八首 赠侯光炯教授 张继文
- 28 侯光炯日记(选登) 侯光炯
- 30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访侯光炯教授 刘耀辉
- 37 改革开放,造就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我的父亲刘兆吉 刘重来

录

档案拾遗

42 校档中的侯光炯

封二、封三

46 反右派运动中“右派”言论及“整风”史料选登

校友天地

49 瀚海明珠

——追寻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 52 载育瓜路 王慧敏

校史校情

53 晏阳初与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晏鸿国

55 西南大学寻根(之二)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 洪秋冰

58 笑貌言行历历在 点点滴滴总关情 张小真

藏藏之声

63 建国 60 年西南大学毕业生就业纵览 刘沐璠

他山之石

70 南京大学档案馆信息化建设 王 娜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023-68252544

13436113550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2544

投稿信箱 xdjy2009@126.com

邮编：400715

照排：海华技术服务部

记忆：

历史之基

智慧之源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档案事业 更好地科学发展并为科学发展服务

——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上)

(2008年12月19日)

□文 / 杨冬权

同志们:

这次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是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召开的,是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2008年全国档案工作,部署2009年全国档案工作,引导各级档案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档案工作,促进档案工作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服务,同时加快实现档案事业自身的科学发展。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同志将同与会代表座谈并作重要讲话,这将对今后的档案工作提供新的指导,形成新的推动,我们一定要在明年的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

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2008年全国档案工作的基本情况

2008年,我们国家接连经历了一些难以预料、历史

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面对国际经济环境重大变化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突然冲击,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档案部门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积极主动服务,推进各项业务建设,档案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档案工作继续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就汶川地震档案抢救和电子文件管理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三峡工程档案工作和移民档案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作出批示,要求全市档案工作者为建设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做出新贡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多次对档案工作作出批示和指示,就积极发挥档案作用、地震灾区档案收集抢救、确保档案安全等提出指导性意见和明

确要求，在接到关于汶川地震中档案人员伤亡的报告后，当即让我们转达他的亲切慰问。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万多张照片及一批录像带捐赠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对档案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经国务院同意，56个地震重灾区档案馆的恢复重建被列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做好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档案交接与管理工作的意见》，对机构改革中档案的归属与流向进行规范。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中央档案馆设置中央国家机关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对社会提供查阅中央国家机关政府公开信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中央企业的领导也继续关心支持档案工作。上海市市长韩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档案馆等基础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批示充分肯定浙江民营企业档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批示要求认真做好省档案馆新馆建设相关工作；省长黄小晶亲自听取汇报，对新馆建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要求将反映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期间抢修电网情况的纪录片保存一份在省档案馆，并强调林权档案是林改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省长吴新雄批示要求高度重视档案工作。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河南省接受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后批示要求进一步开创全省档案工作的新局面。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两次就《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件选编》的编选工作作出批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带头移交公务活动中获赠礼品档案。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全省各级政府继续关心支持档案工作。甘肃省委书记陆浩批示要求各级档案部门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书记陈建国要求把自治区和银川市新档案馆建成安全保管档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面向社会提供档案信息服务和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的现代化档案馆。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要求民政档案工作开创新局面，为民政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视察解放军档案馆，要求确保遇有突发情况时档案资料完好无

损。交通银行行长李军指示汶川地震灾区分支行做好档案安全管理工作。

各级领导同志对档案工作的关心支持，激发了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促进了各项工作跨上新的台阶。

(二)广泛开展“重新认识档案工作”大讨论，积极参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今年年初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传达令计划同志同我局领导班子谈话精神后，各级档案部门按照令计划同志的要求，开展了“重新认识档案工作”的大讨论，对档案的价值，档案工作的性质、地位与作用，档案人员的成才条件和成长方向，档案事业发展的思路与出路等，在认识上有了新的升华。在大讨论活动中，各级档案部门学习理论、明确思路，学习先进、寻找差距，学习业务、强化素质。有的省召开了大讨论成果交流会，浙江省还把大讨论成果汇编成册，《中国档案报》对各地的大讨论成果作了报道。这场大讨论对于广大档案工作者进一步树立新的工作理念，开辟新的工作领域，探索新的工作方式，确定新的工作目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今年，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部分试点地区和省以上档案部门，参加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活动中，各单位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认真分析档案工作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深入查找影响和制约档案工作为科学发展服务及档案事业自身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消除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模糊认识，摆脱那些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机制的束缚，在提高思想认识、更新工作观念、转变工作思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三)档案工作为我国应对大事、难事、要事发挥作用

在极不平凡的2008年，我国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围绕着国家的一系列大事、难事、要事，各级档案部门始终把服务大局放在首位，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档案服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年初南方地区遭受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考验面前，灾区档案部门奋起积极开展档案服务工作，提

供了大量抢险救灾一线急需的工程档案信息,为千方百计保交通、保供电、保民生做出了贡献。

3月14日拉萨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新罪行。为了揭露达赖集团的分裂言论,国家档案局连续利用33件涉藏档案,制作了5个专题网络视频,分三批在国家档案局网站公布,有国内外300多个中文网站和100多个英文网站转发,国家档案局网站点击量累计近200万人次,点击者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各大媒体就此作了相关报道。凤凰卫视也作了专题报道。同时,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也以其他方式对外介绍了相关档案。这些档案的发布,以铁的事实证明西藏从元代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由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回击了达赖攻击西藏“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谎言;揭露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残酷黑暗的本质和恶劣的人权状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档案馆及时主动地为有关领导同志紧急提供了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方面的档案资料,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唐山市档案局主动根据馆藏档案,分不同专题编写资料,对抗震救灾工作提出建议,上报有关部门。国家档案局及时将这些资料修改编辑为《从唐山抗震档案看当前抗震救灾应注意些什么》,报送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并通过国家档案局网站向社会发布,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借鉴。抗震救灾过程中,灾区各级档案部门立足本职,在艰苦条件下,积极提供档案,服务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今年8月和9月,奥运会和残奥会相继在我国成功举办。档案工作者积极参与了奥运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国家档案局参与奥运筹办有关单位文件材料收集归档问题的研究并代拟相关文件。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等设有奥运赛区地方的档案部门建立有效工作机制,加强统筹监管,搞好跟踪服务,及时组织奥运档案的收集、整理与移交工作;总参办公厅、武警总部也就做好相关档案工作提出要求。通过这些工作,档案部门忠实履行了为国家积累和留存珍贵奥运档案财富、传承和弘扬奥运文化的责任,实现了在历届奥运会中留存档案最完整、最系统的目标。北京、青岛等地的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因此而获得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称号。

今年10月,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这一实现我国空间技术发展重大跨越的宏大工程,也凝结着档案人的贡献。仅总装备部档案部门在“神七”任务期间,就收集文件资料2万余件,整理归档1350余卷,接待利用者2480人次,网络发布档案信息10万多条,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档案工作为科学发展服务取得显著成绩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现场会,总结交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部署今后农业农村档案工作的任务。各地档案部门积极拓展工作思路,促进档案工作服务“三农”。湖北省开展“三农”档案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共建立示范乡镇608个、示范行政村1602个、示范科技户1070个。北京、安徽、山东、贵州、云南等省、市档案局分别出台相关文件或召开专门会议,推动档案工作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辽宁省档案局重点推进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进县档案馆和林改档案工作,为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发展服务。吉林省制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管理办法》,为推进林改工作服务。湖南省一些地方推行“村档乡管村用”,探索建立有效的农村档案管理模式。

各级档案部门进一步加强民生档案工作。河北、山东等省加大民生档案接收进馆力度,为帮助解决民生问题发挥了作用。浙江省档案局开展民情档案试点工作,为党委、政府服务民生提供档案信息服务。云南省档案局启动“民心工程”,推行“档案公示制”。青岛、成都等地档案局组织编写民生档案利用指南,方便人民群众了解与己有关的档案怎么查、到哪儿查。天津、宁波、沈阳、杭州、武汉等地出台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文件。哈尔滨市档案局着力构建全市档案服务民生综合体系。西安市各级档案部门层层推动民生档案工作并取得实效。

为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国家档案局与国资委联合召开座谈会、开展调研,以促进中央企业档案工作更好地适应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要求;与国务院三峡办研究落

实了三峡移民工程档案管理调概资金；开展了重点建设项目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巡回检查。重庆市档案局密切配合移民部门，强力推进三峡移民工程档案工作，四期移民工程档案工作通过国家验收。四川省发布《重大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办法》。济南市档案局围绕本市为迎接第十一届全运会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积极做好重点建设项目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天津市各级档案部门开展企业档案服务月活动。江苏省印发《民营企业档案工作要则》，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民营企业进行档案工作分类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与自治区国资委、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实施细则》，对档案处置的经费保障作了明确规定。陕西省组织编写了《民营企业档案工作指南》，并通过非公有制企业档案工作规范管理示范单位全面带动同类企业档案工作发展。

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档案专业报刊出版单位精心策划，深入宣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特别是档案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各级档案部门或配合各行各业纪念活动，积极热情做好档案服务工作，为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档案；或以征集相关档案资料、举办展览、出版史料汇编、召开学术讨论会、撰写纪念文章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中国档案报社与深圳市档案局共同主办了“镜头记录历史——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全国档案人摄影作品展”。中国档案杂志社与广东省档案局联合召开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座谈会。黑龙江省档案局联手省电视台，举办“珍贵记忆——改革开放 30 周年档案信息征集发布活动”；南京市档案局开展“幸福的记忆——家庭档案展”系列宣传活动，展示改革开放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巨大变化。

根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要求，国家档案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分别组织开展了市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测评工作，今年共有宁波、沈阳、杭州等 25 个城市档案馆晋升为“国家一级档案馆”，176 个档案馆晋升为“国家二级档案馆”。参加测评的档案馆扎实开展工作，内强管理，外促服务，为推进所在城市的文明建设付出了努力。武汉市圆满完成本市创建

国家级档案馆任务，为武汉市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做出了贡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各级国家档案馆切实履行《条例》赋予的职责，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中心建设，完善文件报送监督机制，丰富查阅手段，受到人民群众好评。天津、江西、广东、贵州等省市档案馆的政府信息查阅服务工作得到国务院办公厅调研组的充分肯定。青岛市文档服务中心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广州市档案馆开展网上查询政府公开信息和档案资料服务，群众满意度达 100%。

（五）档案事业发展更加协调

档案工作抗震救灾机制初步形成。“5·12”特大地震造成了档案工作者伤亡；共有 9 个档案馆毁坏，38 个档案馆严重损坏，56 个档案馆损坏；有 90 万卷档案被掩埋，151 万卷档案受损；其中北川县档案馆完全倒塌，馆藏 8 万卷档案被泥石流掩埋。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这次地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灾区各级档案部门发扬顽强拼搏精神，积极开展自救，努力把地震对档案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特别是四川省档案局，全力以赴抗震救灾，精心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国各地档案部门尽其所能，给予了深情帮助。地震发生后，国家档案局立即就加强震区的档案保护抢救、档案服务工作，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文件材料收集归档以及灾后恢复重建时期的档案工作等印发了相关文件，并数次派出专家组，实地指导受灾档案的处置和抢救工作；地震波及省、市的档案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深入灾区指导档案部门的抗震救灾工作。根据“一省帮一重灾区”的原则，国家档案局组织协调有关省市档案部门迅速与重灾区档案部门建立起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关系，相关档案部门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给了灾区档案部门以及时、有力的支持，目前，援建工作仍在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向前推进。同时，广大档案工作者踊跃捐款、主动交纳“特殊党费”，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尽绵薄之力。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财政下达了北川档案抢救和保护专项经费，在全国档案抢救专家的指导下，北川档案抢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

档案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国家档案局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议,提请将修改《档案法》列入国务院2009年立法计划,并开始起草《档案法》修订草案。国家档案局与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印发了《卫生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档案管理办法》。各级人民政府也重视加强档案法规建设,如吉林以省长令发布《吉林省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湖北以省政府令发布《湖北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试行办法》,新疆以自治区政府主席令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活动档案管理规定》,广州以市政府令发布《广州档案管理规定》。国家档案局先后对北京、天津、河北、青海、贵州、海南等6个省级档案馆进行了档案安全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内蒙古、黑龙江、浙江、湖北、广西、海南、四川、厦门等省(自治区)、市人大分别进行档案执法检查,或就档案立法、执法等问题开展调研;辽宁、河南、广东、四川、杭州等省、市档案局开展了档案行政执法检查。

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工作继续开展。今年截至目前,国家档案局已先后对辽宁、福建、青岛、河南、新疆、广西等6个省(自治区)、市进行了评估。接受评估地区以综合评估为契机,狠抓档案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促进了本地区档案事业全面发展,取得了可喜变化。北京、河北、福建等地由省市委办公厅、省市政府办公厅发文,提出进一步加强本地区档案工作的意见;上海建立市和区县档案局馆联动机制,这些都对推动本地区档案工作整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机关档案工作更加扎实。国家档案局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档案整理与数字化现场会,总结了近两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档案工作,特别是档案数字化工作和移交进馆工作,对今后一段时间中央和国家机关档案工作进行了部署。各级档案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档案局8号令,推进机关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编制工作。河南省对机关档案工作开展规范化管理认证。哈尔滨市建成市政府机关档案管理中心和市委党群机关档案管理中心,受到有关方面肯定和好评。

档案馆工作健康发展。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确保

档案利用安全的通知》、《关于加强汛期档案安全保管的紧急通知》、《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副省级市以上档案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天津市已连续第4年开展档案安全服务月活动。湖南省档案局印发《湖南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国家档案局召开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研讨会。广东省档案局探索建立“区域性档案修裱中心”。西藏自治区档案局认真组织做好藏文历史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国家档案局和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单位联合发布《档案馆建设标准》,为档案馆建设提供了规范性依据。河北、江苏等省的市县档案馆建设势头良好;吉林省设立综合档案馆建设专项资金,对市县建馆进行补助;江西省档案馆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青海省档案局多方筹措资金,实施《青海省档案馆库更新改造规划》,有12个州县档案馆建成并投入使用;新疆第一批自治区补助资金1000万元已经下拨各地,全区地、县级档案馆库建设项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河南省开展聘请“荣誉馆员”活动,探索群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新途径;甘肃省开展“档案资源建设年”活动,建设具有甘肃特色的馆藏档案体系。宁夏、长春等地出台关于加强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展档案目录清理工作,为档案数字化奠定基础。

档案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受中国科协委托,中国档案学会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电子文件管理机制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报告受到中央和中办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组织有关单位并由国家档案局牵头起草《电子文件管理办法》,目前初稿已征求意见。该《办法》将覆盖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对于实现全国电子文件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加快推进山西省数字档案馆项目有关工作。安徽省档案局承担的省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和相关标准起草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被省政府授予“数字安徽”五年建设电子政务领域先进单位称号。海南省档案馆开通“已公开现行文件网上利用中心”系统,实现了省直机关文件的自动在线接收、管理和利用。重庆市档案局积极参与重庆电子政务建设,开展了电子文件中心试点工作。甘肃省档案

馆电子文件中心正式成立。宁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联合颁布《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办法》。大连市积极推进传统载体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厦门市数字档案馆二期项目开始实施。深圳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接收管理系统投入使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快推进兵团范围内电子档案数据共享。《西安市数字档案馆数据库建设一期方案》被列入全市信息化建设项目。武警部队加强对档案信息化检查指导,部队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取得新成果。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与中央纪委监察部联合拍摄的110集文献电视片《周恩来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电视金鹰奖。《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档案文献丛书》和《城市解放》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国家档案局与教育部协商在各级国家档案馆建立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示范基地,并确定了第一批试点单位。上海市第二届档案馆日活动吸引了众多百姓参与。福建省档案馆与多家报纸、电视台合作,多专题开展档案宣传。广东省档案局与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合作推出的“解密档案”栏目获中国广播电视台协会第二届“纪录·中国”金牌栏目奖。青海省档案馆承担的“清史工程”项目顺利完成。宁夏、广西自治区档案馆分别为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提供高效服务,受到自治区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好评。“中国档案珍品展”在江西巡展。各地档案部门举办了大量各具特色的档案展览,为人民群众提供档案特色文化服务。

档案科技教育工作稳步推进。2008年,有29个科技项目被列入国家档案局科技计划,29个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拟授奖项目正在进行公示。国家档案局加紧组织编写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多媒体教材,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全年共培训700人次。北京市档案局首次开展档案专业网上继续教育培训,天津市档案局实施“185人才培养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举办全区首届“232档案人才培养工程”培训班。中国档案学会召开的2008年档案工作者年会,与会者达1200余人,为众多档案工作者进行直接交流提供了有效平台。

档案工作对外交流与合作保持活跃。国家档案局组团赴新加坡出席国际档案学术会议,并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共同签署《中新两国2008—2012年档案工作合作协议》;赴马来西亚出席第十六届国际档案大会,我国代表在会上分别作了服务民生、地震、电子文件等专题发言。赴俄罗斯出席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工作小组第五次会议,有关合作取得新的进展。赴瑞典、新西兰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信息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档案与文件管理技术分委员会第二十、二十一次工作会议,赴韩国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年会暨东亚地区档案馆在线公共服务研讨会,承办了第二届中韩档案管理研讨会、瑞典国际文件管理高级研究班第三阶段培训等,相关业务交流更加深化。我国国家档案局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档案馆在上海举办了“穿越时空的彩虹”展览;北京市档案局、沈阳市档案局分别在美国举办“走进北京2008——摄影之旅”、“映像沈阳——中国沈阳的过去与现在”展览,上海市档案局在以色列举办“上海风情”图片展,这些活动不仅拓展了档案部门的对外交流范围,而且成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有效载体,极大丰富了档案工作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内涵。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档案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主动性需要进一步增强,档案部门的内部管理和档案工作各项基础业务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档案工作为科学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档案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需要进一步优化,制约档案事业自身科学发展的诸多矛盾需要进一步解决。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用科学发展的理论进行认真分析,用科学发展的方法加以妥善解决,促进档案事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责任编辑:王娜)

西南大学档案馆

关于公布各单位档案工作 分管领导和兼职档案员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了加强学校档案工作管理，建立学校档案工作网络，明确各部门档案工作职责，经各单位推荐分管档案工作领导和兼职档案员，档案馆核查，主管校长审核，现予以确定和公布。

荣昌校区、研究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档案工作网络可参照确定。

附件：西南大学各单位档案工作分管领导和兼职档案员名单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南大学各单位档案工作分管领导和兼职档案员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分管领导	兼职档案员
1	党委办公室	罗朝明	陈正梅 彭瑞香
2	党委组织部	李建光	孙晓玲
3	党委宣传部	张国镛	魏治平
4	党委统战部	李树明	郭从蓉
5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朱晓明	邬润华
6	工会	聂海霞	戴 鸣
7	团委	胡建军	王 鹏
8	校长办公室	高 岩	朱 军
9	教务处	周光明	何庆生
10	科学技术处	肖亚成	王世朴
11	社会科学处	李 惠	黎晓兰
12	研究生部	张 斌	邓晓东
13	人事处	刘光远	韦苏茜
14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 航	郑瑞芹
15	学生处	李荣华	刘立广
16	离退休工作处	朱 敏	谷剑飞
17	保卫处	张邻川	张剑兰
18	财务处	何跃群	任元明
19	基建后勤处	余宗财	吴志力
20	审计处	吴新宇	戴瑞君
21	国有资产 管理处	邓方兰	屈 毅
22	招生就业处	何晓阳	田再悦
23	经营性资产管理 办公室	秦福生	柯 瑶
24	发展规划处	张代平	刘 飞
25	校地合作处	程运康	奉晓琴
26	校友工作 办公室	毛 苹	何定龙
27	图书馆	周德超	黄世平
28	培训学院	林 萍	庄 群
29	信息中心	张自力	刘旬华
30	学报编辑部	孙 凡	徐晓霞
31	出版社	刘春卉	张永华
32	档案馆	蒋 涛	杨 伟
33	医院	李晓玲	向春容
34	后勤集团	秦 燕	祖莹慧
35	继续教育学院	胥树成	阚 军
36	网络教育学院	刘 林	黄越岭
37	教学实验农场	张荣强	李正合
38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亢 犀	吴 霞 郑桂君
39	经济管理学院	朱泽山	张和碧
40	法学院	尹晓东	吴俊明
41	文化与社会 发展学院	杨爱华	蒋 娟
42	教育学院	杨尚秋	卜越威

序号	单位名称	分管领导	兼职档案员
43	心理学院	尚 伦	骆一 苏 缇
44	文学院	张 勇	占如默
45	外国语学院	廖万洪	李应坚
46	新闻传媒学院	邓 力	朱高峰
47	音乐学院	叶 荫	印显明
48	美术学院	谭 琳	叶晓娅
49	历史文化学院	张明富	李 莹
50	数学与统计 学院	杨 劲	姜文群
51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李竹英	吴 曦
52	化学化工学院	李远蓉	郑永利 孙丽媛
53	生命科学学院	李素伟	张家辉
54	生物技术学院	徐 水	秦玉梅
55	地理科学学院	刘文政	粟 辉
56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姜立慧	李月英
57	资源环境学院	骆云中	陈 惠
58	工程技术学院	李光林	刘尧萍
59	纺织服装学院	冯沈萍	陈家莲
60	食品科学学院	王亨洪	雷德君
61	园艺园林学院	宋 明	李泽阳
62	农学与生物 技术学院	刘 肃	庞江春
63	植物保护学院	肖崇刚	胡伟伟
64	动物科技学院	张新富	李兴平
65	药学院	李 竞	石 敏
66	计算机与信息 科学学院	陈 朗	张玲娅
67	体育学院	夏思永	焦天霖
68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 理研究中心	张诗亚	张培江
69	教育科学 研究所	张大均	徐中仁
70	基础教育 研究中心	于 波	陈中华
71	高等教育 研究所	赵伶俐	汪 宏
72	文献所	邓章应	郭丽华
73	中国新诗 研究所	蒋登科	左凤丽
74	生物技术中心	裴 炎	罗小英
75	幼儿园	宋 武	赵友斌
76	西南大学 附属小学	张 旺	潘 宏
77	西南大学附中	邓晓鹏	殷合伦
78	培训学院 (教育管理学院)	林 萍	庄 群

(注：以上名单略有改动，杨伟订正)

编者按:侯光炯(1905—1996),字翼如,著名土壤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原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名誉校长。侯光炯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35年他以第一位中国人代表的身份,代表我国参加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并宣读论文,首次对水稻土的发生、层次形态划分,特别是水稻土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震动了国际土壤学界。他长期深入农村,提出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等农业土壤新概念和新观点,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他创办我国第一个自然免耕研究所,攻克了“‘生态防洪、免耕治土’长江上游生态农业示范区”等重大科研课题。本期《西南大学记忆》通过侯光炯教授的亲人、学生、同事的回忆,再现他对祖国土壤事业激情澎湃的热爱,对亿万农民感人肺腑的挂牵!



1937年侯光炯(左一)在湖南衡阳调查土壤时与两个小向导合影

我的父亲侯光炯^①（上）

□文/侯啸培



前 言

对子女的情，对祖国的情，对党的情，对事业的情，对人民的情，父亲的一生就像一支情烛默默地燃烧着自己，温暖着别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点滴小事可能很平常，但也许能激起人们些许沉思。仅以此陋文献给我痛思的父亲侯光炯教授百年诞辰纪念。



侯光炯与小女儿啸培

^①本文是侯光炯教授的小女儿侯啸培 2005 年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而作，原题目为《情》。

一、“无情的”父亲

童年的苦闷

打从我记事起，也就是 1952 年前后吧，当时父亲在重庆北碚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职，已属声望较高的名教授，地位变，工资高，照一般人想象我这个幺女儿一定是个被娇宠的小公主。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如此，哥哥姐姐们大我较多，平常都在学校住读，家中只有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了。母亲因 39 年生小姐姐后，月子里与父亲在泥土屋里做土壤粘韧曲线测试受了严重的风寒加之过度劳累落下病根，从此卧床不起，基本处于半瘫痪的状态。而父亲则更是由于饱尝了旧社会知识分子有志不能报的苦楚，在新社会感受到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干劲倍增，恨不能使出全身力气将旧社会耽误的时间追回来。他对事业已达到痴狂的程度。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不在家，不是带实习，搞野外教学，野外调查就是开会。即使在家的短短日子里，也总是那么忙碌，他没有什么上、下班之分，节假日之分，整天要么上课，要么开会，要么搞科研，要么写文章，一批又一批的老师、学生、院系领导常在家里研究工作，探讨问题直到深夜。因此，从小父亲就没有什么时间、没有精力带我上街买玩具、看电影、吃东西、逛公园。在我记忆中大约只有一次在成都，父亲带我从川大桃林村走到九眼桥附近，还给我买了一个洋娃娃，就这已算是我童年最幸福的回忆了。因为家庭的这些特殊情况，我从小除了上学以外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接送父亲出差，归来。照顾病中的母亲，请医生，拿药。跑很远的路为父亲和家中的客人买烟，买茶，买物品。看着其他小朋友经常随父母上街去玩，看电影，逛公园，我心里非常羡慕，不

由暗自叹息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快乐家庭啊！

“古怪的”训斥

在我童年的感受中，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用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来要求我们不要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例如他对每一个子女都有一句“格言”要求。对我，父亲要求我每日记颂“万日万功”，也就是人活在世上，每一天都要为集体为周围的人做好事。姐姐哥哥们基本上都遵守了父亲的要求。而我这个刺头子，爸爸第一次教训就受到了顽固的抵制。当时我大约 7 岁多，那天中饭前，爸爸先给我讲了什么叫万日万功，然后要求我每天饭前先背诵“万日万功”再吃饭。当时我牛劲上来了，我并不反对每天为别人做好事，但我决不先背、后吃饭。我说“不听不听猴儿念经”，“我才不每次吃饭前都背呢”。爸爸说今天你不背，我就不吃饭，我说不吃就不吃，我就不背，两人就这么僵持着，谁也不吃饭。这时旁边的妈妈发火了，将碗一推说“这顿饭我也不吃了”，碗在地上滚了一大转，饭全撒了，碗竟毫发无损。见病中的妈妈发火了，我吓了一大跳，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赶



1948 年侯光炯夫妇和五子女在成都农改所

紧站起来，“我说我说，万日万功，我一定要万日万功”。爸爸赶紧安抚我和妈妈，并告诉我这句话会给我的一生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不管我当时理不理解，但以后我的一生确实在按照父亲的要求努力去做，并从中感受到它给我带来的快乐。

“地道战”观后感的争鸣

父亲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带我看电影。在我稍大一些后，随几个要好的朋友步行到较远的北碚街上看电影。一次看“地道战”回来后，我仍沉浸在精彩场面的回味中，还未到家门就一路高喊着“平安无事啊，铛铛。”恰好那天父亲在家，见我回来，父亲就问“好看吗？故事都讲了些什么？给爸爸妈妈讲讲”。我还是一个劲地叫“平安无事啊，铛铛。”“平安无事啊，铛铛。”这时父亲发火了，大声责问“这就是你最感兴趣的吗？你究竟看进了多少，用脑子去思考了吗？这样毫无意义地看电影，今后不要再去看了。”简直如雷轰顶，委屈和气愤一涌而上。我将自己反锁在厕所里，又跳又哭又叫，“你从来不带我看电影，你还要管我看电影，我才不理你呢，我就要这样看电影。”哭叫累了，坐在马桶上生闷气。这时，门外传来父亲轻轻的呼唤：“亲爱的小翼啊，爸爸的确从来没有带你看过电影，没有带你去玩耍，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但爸爸是真正的爱你，希望你健康的成长。你出来我们一起好好谈好吗？”我回想自己刚才的作为，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慢慢走出门，爸爸拉着我的手坐到椅子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任何一部电影，一篇文章都有它的中心内容，通过故事情节告诉人们一些做人的道理，讲述一段历史，歌颂英雄人物，揭露敌人的凶恶本质。使你知道该爱什么，该恨什么。你今后不管看任何电影或书籍，都要用心去想，去总结，去学习。并且养成记心得，记笔记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这些话至今仍萦绕在我耳边，伴随着我成长。

“梦想”的破灭

十七岁天真单纯的我穿着一套蓝布衣裤，扎着一对长长的大辫子，带着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从北碚乘

车来到成都踏入大学的校门。校园生活五光十色，一些同学经常变换着时兴漂亮的服装，吃着各种精美的零食，特别是当时新上市的各色风雨衣更是令我十分羡慕向往。而我这个冠着全国知名专家学者的教授女儿，每月父亲只给了我20元生活费，除去13元5的伙食费后所剩无几。我当时使用一把破油纸伞也开了几处口子，实在不好意思再用这把伞了。于是我写信向父亲请求允许我买一件风雨衣。信寄出后我日思夜盼，心想父亲一定不会拒绝我这一点小小的请求吧。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遍扫信纸，怎么竟没看见一句“钱已寄出”的话，一股寒流浸透我的全身，伤心的泪水喷涌而出，我真有点恨这个“抠”爸爸。过了好一阵才又打开信纸，父亲在信中说：“亲爱的小翼，你的来信收到，得知你想买一件漂亮的风雨衣。我和妈妈想，我们的小翼穿上这件风雨衣一定非常漂亮，非常洋气，非常的与众不同。同学们都会十分的羡慕你。但是我们又想，你穿上这件风雨衣可能更多的同学会冷漠你、疏远你。觉得你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小翼啊！我和你妈左思右想怎么办才好呢？后来我们想小翼还是去把油纸伞补好，它照样可以遮风避雨，你也将永远的融入到同学中，你说对吗？”我反复看了无数遍父亲的来信，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的确，在我周围更多的同学是没有一件像样的衬衣，有的甚至经常打赤脚，戴草帽。但是他们却非常刻苦、勤奋、乐观向上。父亲不是给不起一件风雨衣的钱，而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要求，将子女打磨成才。



侯光炯与妻子、女儿在一起

二、情的滋润

快乐的节日

每个人都有童年最幸福的回忆。我虽没有父母带我上大街、逛公园、买玩具、看电影的回忆，但我也有童年最快乐的时光，那就是父亲在家的日子。由于父亲深知母亲的病是为父亲的事业劳累而得，为了事业父亲又不得不经常出差在外，无法照料母亲。他对母亲总是怀着深深的歉疚，也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每当父亲出差回来，我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总是用那么深情的目光注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苍白的脸上泛着幸



1964年侯光炯教授与夫人黄敬贤合影

福的红光。爸爸为了解除妈妈的病痛，增强她战胜疾病的信心，经常利用与亲人的独处的宝贵的时光想方设法逗妈妈高兴。他会讲外面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故事，会字正腔圆地唱歌，唱京戏，唱自己编写的赞美妈妈的滑稽歌曲，还要边唱边扭秧歌，踢腿，滑一字，这腿竟能踢得贴着额头。最有趣的是爸爸的拳头竟能将墙擂得震天

响，每当这时妈妈忘记了所有的病痛和烦恼，笑得最为开心，甚至在爸爸和我的一再请求下竟也能用走了调的嗓音唱起了家乡的小调。而我则更是围着爸爸妈妈又唱又跳，又喊又笑，那高兴劲头真胜过大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父亲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对祖国、对事业、对母亲、对家庭，怀着深深的爱，浓浓的情。

父 爱

1966年10月，母亲去世后2个多月父亲才写信告诉我这一噩耗，当时我悲痛得全身发抖，双脚抽筋，但还“无权”放声大哭。我深知父亲为了不让我太悲伤，他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母亲后事的料理，这里面饱含的深情使我终生难忘。我知道父亲是要让我的心中永远保持母亲美丽端庄的音容笑貌。我经多方申请得以回家探亲。清晨八点多钟赶到家后却不见爸爸身影。旁边邻居段大姐一见我就紧张地告诉我：“今天一大早起床后就发现你爸爸不在家，到处打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最近最担心的是侯老师会不会想不开。”她的话未讲完，我的头“嗡”的一声，人似乎都麻木了，泪水一个劲往外涌。段大姐见状急忙安慰我，说她已告诉几个老师，叫他们帮忙寻找，就在一片乱哄哄的气氛中，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我急忙冲出屋，看见了日夜思念的父亲。他穿着一套发白的兰布衣裤，一双破解放鞋沾满了黄泥。他吃力地爬着楼梯，脖子上的疮流出的脓血水浸出黑黑的纱布。手里紧紧地提着一块半肥瘦的坐燉肉。见我泪流满面的迎过来，他瘦削苍老的面容上挂满了令人心酸的幸福笑容，兴奋地说：“小翼啊，今天我终于买到了最好的坐燉肉，我要亲手为你做一

顿丰富的午餐,让你尝尝我们家乡的红烧肉。”原来,当时猪肉凭肉票购买,好点的肉往往一大早就卖完了。父亲为了招待远方回来的女儿,不到5点就独自跑去天生桥肉铺排队购肉。望着短短时间内头发就已变得花白的老父亲,望着没有了母亲的大木床,望着已被“清扫”得空荡荡的屋子,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但当我看见爸爸神态坚强地蹲在蜂窝煤炉前吃力地煽着火,呛鼻的浓烟布满整个楼道,我感到无比羞愧,赶快擦干眼泪,来到父亲身旁一道烧火做饭。我们两个都是不太会厨房活的臭皮匠,最后勉强做了一桌饭菜,爸爸的红烧肉虽然只是一锅酱油红糖水猪肉,但这是我21年来第一次吃爸爸亲手为我做的饭菜,香啊!他一直甜到心头。

一心一意

“文革”刚开始,父亲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不能上讲台,不能搞科研,昔日的紧张繁忙没有了,昔日的人格尊重丧失了,苦苦栽培多年的学生一耳光打在父亲的脸上,痛在了老人的心头。本已重病缠身的母亲更是整日为父亲担惊受怕,愁上加愁,病情急剧恶化,终于在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混乱的医院治疗下闭上了忧伤的双眼。这一切没有击倒父亲,因为他纯洁的心灵中更饱含着对党的热爱,对党事业的忠诚,他相信共产党会救中国。他遵从红卫兵的要求,努力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教育方式和科研路线,认为自己以前确实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他认真参加劳动的改造,认真挑粪,认真挖田,认真扎扫把。哪怕脖子上生疮用双手托着扁担也要挑粪。白天劳动,夜里一有空就在想今后应当走怎样的道路才能造福于人民。似乎文化大革命让他得到了启迪,有了更多的构思和设想,以至于入迷到将他的批判会发言变成了办学方针,科研路线的学术思想论述。他精辟的发言和赤子之心令到场的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自然在文革中也会受到牵连。红卫兵将我从纯洁的组织中清除。父亲只有仅够自己的一

点生活费,无钱供养我,只有靠哥哥接济。毕业分配也被晾在一边,不得不自寻出路。但我丝毫不怨父亲,因为我已逐渐了解爸,认识爸。我坚信一点,他爱党爱人民爱党的事业。我随时回家去看他,希望他正确认识自己,抬起头来,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记得最有趣的是1968年9月,我回家看望爸爸,当时他还在学校劳动改造。白天我陪着他在地里干活,晚上我拿出一副扑克告诉父亲说:“来,我帮你算个命。”(这是当时成都很流行的一种算命法)前面所有过场走完后,最后由父亲抽出4张牌:一张红桃A,一张黑桃6,一张方块10,一张黑桃7。于是我按照各张牌的规定含义解释给父亲听:红桃A,A就是1,也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说你将仍然可以一心一意地继续从事你的事业。黑桃6,6代表前途宽广,六六大顺,一帆风顺,你不光能继续从事你的事业,你还可以作出一番大事业。方块10,10代表钱,即财源茂盛,经济宽裕,就是你的生活和事业都会有经济保障。黑桃7,7就是气。也就是你虽然能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但仍有各种困难和磨折,会引起心情不愉快,自己要注意克服困难。听了我这一番解说,爸爸从内心感到无比愉快,他信了。拿笔将以上几条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并连说“算得好,算得好”。虽然爸爸也知道我是一通乱侃,但这正是他心中的心愿,是他一生的追求,因为在他心中只有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我似乎逐渐走进了父亲的内心世界,感受着他情的浇灌。



20世纪80年代侯光炯(后排右四)与家人、学生等合影

(责任编辑:洪秋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恩师待我情^①

——追忆侯光炯教授

□文/江育璋^②



侯光炯(左)八十九岁生日与学生江育璋合影于侯光炯家中

侯老师真的离我们而去了！那庄严肃穆摆满花圈的灵堂，哀乐低徊伴随着臂配素花前往悼念的人流，无不证实了这令人震惊的事实：侯老师走了！我今后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到侯老住地去送他上车回长宁，企盼着他下次再返学校了。当想到我再也不会见到他，再不能听他述说对土壤科学的新体验；再不能聆听他一个接一个的新的工作计划；再也不可能和他一起促膝谈心，共话家常，总忍不住噙满泪水，喉头哽咽！

侯老师是我的老师，我的领导，我的长辈，到最后，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了。侯老是中

外驰名的土壤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认定目标，坚定不移。他是中科院院士、一级教授，但他却是那么平易近人，幽默诙谐。他是农民的孺子牛，是学生的好老师，是党的优秀党员，是大地忠诚的儿子。我这辈子为曾是他的学生、下属、小辈、朋友而感到无尚荣幸！

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听侯老师讲土壤学。他讲课绝不照本宣科，而是融汇了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向学生展示他独到的新观念。他娴熟运用长期在野外工作形成的宏观的认识观，结合古水文和现代水文、古气候和现代气候、大气候和近地面小气候、古地理环境和现代地形地貌、人为耕作措施和作物类型、轮作方式等，对土壤剖面形态和性质的影响；再以微观的观点，结合化学测试结果（侯老尤其推崇土壤PH八联，这是侯老以道南平衡的原理设计的测定方法，其结果代表土壤胶体离子的性质和吸解能力），进行综合分析。我作为幼稚的学生，在课堂上听得晕乎乎的。讲到深入处，他的思维早已插上翅膀，飞向辽阔大地……他时而喃喃自语，像有所悟，时而急速地在他的教学提纲上写着心得。我虽呆傻，还是被他描述的丘陵地区土壤群落学说迷住了。我觉得那真是土壤垂直分布规律在我们多山地、多丘陵地区的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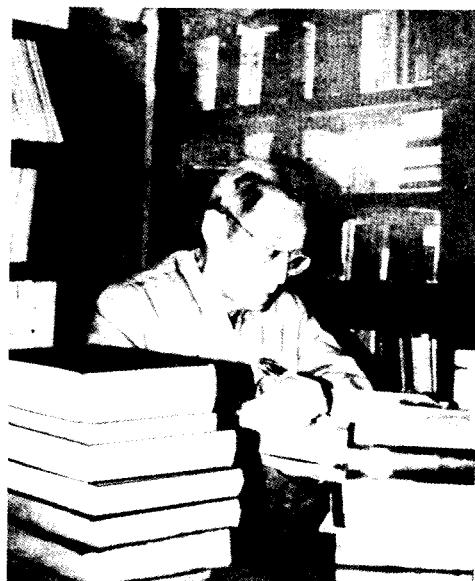
^① 题目有改动，原题目为《忆我的老师、领导——侯光炯教授》。

^② 侯光炯教授的学生，1952级土壤农化系土壤农化专业，曾任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

好归纳和描述方式了。

听侯老的课，要想一条一款地记下课堂笔记是很困难的。他讲的内容是那么丰富，涉及面是那么广阔，像我这种初涉土壤学的学生真难跟上他的思路。唯一的方法是不管懂与不懂，尽可能将老师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下课后与同学核对笔记，向辅导老师讨教。在一点一点地“啃”笔记。甚至重新整理，批注。

1956年中科院为弘扬侯老的学术观点，授权侯老师主持成立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侯老任室主任。他为此周密计划，选留干部。我和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农学系毕业的几位同学共八人被留在刚成立的土研室。为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侯老师派我们到四川省水利厅测量队参加野外测绘工作。还聘任了学院土壤、农化、水土保持、微生物、作物栽培甚至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等方面的专家、教授为土研室客座研究员，指导我们的工作。侯老师亲自制定了上班签到制度，周末举行学术和读书报告会。亲自审阅我们的工作计划，修改我们的论文报告……为了鼓励大家和积累资料、宣传农业土壤，侯老师主持出版了两集“农业土壤研究资料集”。尽管这些研究项目是



侯光炯在自己的书房工作

侯老所订，论文是他亲自修改，有的段落是他亲自执笔，第一辑的前言也系侯老所写，但在这两集论文中却找不到侯老一个署名。甚至他还划掉了他作为指导老师的名字。

1957年侯老师带领土研室部分同志奔赴云南、贵州考察。完成了云南、贵州土壤区划资料两册。在野外工作期间，侯老师以身作则，不畏艰辛，在西双版纳气

温高达40℃的热带雨林中，他总是亲自下到土壤剖面坑内，观察讲解。在这酷热难当的情况下，为防旱蚂蝗的侵袭，大家还得穿上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以致热上加热，大汗淋淋。工作之余，侯老还常应邀给当地干部、农民讲课。有一次在云南河口讲课，有同志提醒侯老火车要开了，侯老说快去招呼一下，让火车等等，课还没讲完哩！当时没有客车，侯老和大家一起乘闷罐货车转点。事后同志们在下面摆谈起侯老这些趣事之余，也为侯老这种为传播土壤学知识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1958年，侯老师将土研室同志分为四个小队奔赴农村作定位研究。计有蓬溪棉花深耕实验，白市驿低产白散堆改造实验，郫县下湿田的改造和梁平山地黄壤的研究。对赴农村驻点的同志反复强调，下去后一定要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要虚心向农民请教，要破釜沉舟，不搞出成绩不回单位。当时驻点同志的户口都迁到农村基点去了，可见决心之大。对留在室本部的同志，布置了双季稻不同品种组合的研究、土壤微生物区系的研究和不同有机肥冷热性质的研究。侯老师还带领大家对试验地田块土壤情况进行了多点调查，发现貌似平整田块，其底部可能是起伏的形状，也可能呈倾斜面。从而提出了全面认识田块的新观点——立体土壤。为正确布置田间试验小区，以及分析、解释同一田块或不同田块出现的生产问题，提供一些依据。

不久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土壤普查高潮，上级分配了四十几名农校和科技校毕业生充实土研室。还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一下子使土研室工作人员猛增至七八十人。侯老师兴奋极了。为新同志写培训计划，亲自为新同志讲课，并带领大家在野外搞试点。同志们分下去后，侯老又组织土壤普查检查团，到四川各地检查工作。白天到农村了解情况听取汇报，解答疑难问题。晚上开会总结当天工作，布置第二天任务。并要求连夜赶印《土壤普查通讯》油印小报，分寄各地土壤普查小分队，以交流经验，相互学习。侯老讲，资料一定要及时整理，及时记下分析所得印象、结论及存在问题。因为这时对资料印象最深刻、思维最活跃。这些资料将是进步

深入研究的基础。这些都是侯老多年工作的心得。使我受益匪浅。

侯老首先提出的土壤生理性能，是以土壤理化性质的时变化为事实依据的。当时在郸县某点，室本部的水稻田间试验以及旱地的棉花实验地中都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测定工作。最频繁的测定是每隔两小时进行一次包括剖面不同层次的土温、土壤水分、土壤 PH 八联、铵态氮、硝态氮和微结构的分析。至少连续测定 24 小时，最多达到 72 小时。在侯老的指导下，同志们轮班休息，每班至少坚持 12 小时的工作。当时我对侯老师常提到的时变化并不很理解。直到我工作多年之后，才深深体会到，变化是绝对的，完全的静止是没有的。土壤看似静止，实际上，随着太阳辐射热的影响，土壤内部的理化性质也随着日出日落和季节的不同产生周期性变化。这就是侯老著名的以热力学为中心的土壤生理性的实质。

侯老思维是很敏锐的，对工作也是很认真的。比如，侯老师订计划，写论文、著作，无不经过多次修改，反复斟酌。我曾和原土研室另外两位同志轮流为侯老当记录。他口述，我们笔录。然后不断将上下文念给他听，待他认可后，我们连夜抄正，等到再念给他听时，他常常又感到不满意，又要重新修改，甚至全部推翻重写。我有时显得很不耐烦，用大道理揶揄他，我说：“侯老，革命发展阶段论啊！”侯老就是这样认真，永不满足，永远随着他前进了的思维活动，感悟到了的新意而修正着自己。不保守，不偏离，而是螺旋式地沿着他遵循的主线前进，正如他老先生发现的土壤时变化一样，既变化，又不重复，但却始终不会偏离太阳辐射热为中心的主线。

对他这一经常变化着的思维，像我这样低水平的人的确不易理解。不知是谁给他取了一个“玄学鬼”的绰号，他听后只是一笑置之，并不分辩。过了好多年，我在给他的信中直呼他“玄学神”。他给我的回信说：“谢谢你替玄学鬼打气，提拔作了神仙……这是最宝贵意外。你的来信给我又甜又酸的好味道和亲切真的好感觉。在我的学生中，你是使我的精神陶醉，雄心勃勃的好老师。”

唉，请大家别嫌我啰嗦，侯老已去，我也老矣！如不把我和侯老相处的一些情况写出来，有些事情恐怕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时间到了 1966 年那个使全国人民无所适从，人人自危的历史时期。侯老师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份被揪出来，而我却是以“黑五类”、“狗崽子”、“走白专道路”的名义被“勒令”和侯老师及其他几位教授、老师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连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休息都被剥夺了。白天，我们由一位农工监督劳动，晚上则到指定的地点由造反派“红卫兵”看守写“检查”。我们劳动的内容包括了全部农活。我在这个“劳改队”里算是最年轻的，对各种农活尚不能胜任愉快，包括侯老在内的几位老教授干起这些从未连续干过的农活来会忍受多大的体力不支，是可想而知的。我认为最重的农活是转粪（把肥料由一个粪池挑到另一个粪池去贮存沤腐备用）。有时一干就是几天，肩都挑红肿了。路途稍长，用一个肩挑就疼痛难忍。必须学会换肩才能坚持。刚学换肩，我那半桶子粪水像有条大鱼在蹦跳，常常洒得我一身。侯老呢，他眼睛不好，路看不清，年龄比我长三十岁，体力更不行。看着他高一脚低一脚的样子，我于心不忍，又不能帮他多少忙。有老师教侯老说，换肩时先将粪桶放下来，换肩后再挑。但侯老师很犟，不服输。他也学着其他老师那样，挑着粪，边走边将扁担由右边换到左边来，但扁担不听使唤，他就成了背着扁担挑粪的模样了。有位老师笑着说：“看！‘苏秦背剑’！”侯老不顾大家取笑，继续“背”着扁担，“摇”着粪桶踉踉跄跄地走着。侯老师哟！我们几位年纪较轻的老师为了照顾他，在给他舀牛粪时，给他一桶只装一泡牛粪，后来被监督我们的农工发现了，狠狠地批评了侯老。唉，同志啊，侯老这么大年纪了体力不好，眼力不行，相煎何太急哟！侯老挑一泡牛屎的故事被传为笑料！我们提起这事，既好笑，又感叹！我们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哟！

春季到了，该撒谷子育秧了。当时还是用的原始方法育秧，先在田里筑成宽五尺的厢面，然后用扁担将厢面赶平整。再撒稻种。春天的田水仍然很冷，我们穿着棉衣，扎上腰带，卷起裤腿下田去了。由于这块水田的泥脚较深，我们个头矮的女同胞，在田里多站一会儿就

往下沉，跨步都很困难，农工同志见我们这副狼狈相，只好叫我们“上岸”了。侯老师也下田去了，他的毛裤脚管较小，卷不上去，加之他的眼睛不行，在那深脚田里根本走不起步子。我们站在田埂上叫他上来，他坚持不肯，继续弯着腰，用扁担尽力赶着厢面。有时他站不稳，只好将两只手插到泥土里，以求稳定一下失去平衡的身子。直到干完活，他早已是个泥人了！等他从田里爬上来，悄悄地说：“田水虽冷，但底层的泥巴是暖和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著名土壤学家参加劳动的体会！他下田劳动不觉得是苦差事，而把这看成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土性的机会！他说出这句话，是我想都没想到的！他的思想境界多么高啊！

秋收了，我们将收获的稻子摊在地上晒干、扬净、装袋。此时，侯老师的儿子侯孝祖从部队回来探亲。侯老师没有请假去陪他，仍和我们一起收拾着那些稻子。侯老师显出愉快的神情对我们说：“孝祖说的，你们这算什么‘劳改’哟，你们这是‘补课’，是补劳动课。”侯老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安慰，它消除了我很大一部分屈辱心理。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步步为营，敌友不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绷紧的时期里，一句理解的话语，一个柔和的眼神，一丝掠过的微笑，一个轻微的点头示意都会使我们感到无限温暖。侯老听到他儿子这一宽慰的话，像一股暖流透过全身，使老人感到慰藉和温暖。把这本不该对他采用的“补课”手段，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

1972年林彪下令解散了不少科研单位。由侯老创办的重庆土壤研究室未幸免于难。单位撤销了。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土研室科研人员中，挑选了一些出身好的同志带着土研室的全部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办公用具等去支援三线建设。我和另一部分同志被留下等待分配。我知道这件事对侯老来说简直就是掏他的心窝。他心情沉重，但却无可奈何！

侯老从“牛棚”回来之后即投入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以夺回被耽误了的宝贵时光。记得他首先应邀考察的是歌乐山林场油橄榄树黄叶凋萎的问题。据林场工作人员介绍，他最初以为油橄榄树可能是缺肥或病虫害引起枯黄的。但经过施肥、打药均无济于事。侯老去后，采用对比法，分别观测、访问、了解好株和病株的土壤情况。发



侯光炯(左三)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

现，凡是生长好的油橄榄树，都是在栽种时，底层页岩经过爆破松碎后的地方；而生长差的都是因赶栽种任务，底部岩层未经爆破松碎即栽上树的地方。前者底层因松软，根系和水份，养分易渗入成为油橄榄树的“安乐窝”。显而易见，后者的根系，在透过表面薄薄的土层后，只能沿岩面横向生长，水分养分均沿岩面流失而导致了油橄榄树的营养不良。如果只注意了灌溉，施肥而无深厚的土壤保蓄条件，油橄榄当然长不好。侯老师为歌乐山林场治疗油橄榄树黄叶枯萎病开的“药方”是：首先挖松底部页岩层再补施有机肥。

从1973年开始，侯老到简阳镇金公社蹲点，搞大窝种植。这是从总结农民在瘠薄土壤上传土种植，局部加深加厚土层的办法衍生提高而来。获得了很大成功。在镇金基点，侯老还布置了很多小试验。如棉花品种退化问题的探讨，从不同母质的土壤对小麦籽粒角质或粉质能相互转变的现象，提出土壤育种新课题的研究等等。侯老师努力工作，除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怀着一颗为党工作，为劳动群众服务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之外，作为一名土壤学家，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也为农业土壤这一新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具说服力的论证。与此同时，侯老也念念不忘恢复他创建的土壤研究室。他除了向上申诉、呼吁而外，就是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建立土研究室的必要性了。从侯老在1973年11月14日给我和另外几位原土研究室的同志写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他在来信中说：“经过一年多来大家的努力，恢复土

壤研究室十、九已成定局。四川省科委领导同志要我们从各方面先开展起工作来再说。作为按月拿固定工资的我们，面对朝朝夕夕战天斗地的贫下中农，我们除立即工作，并作出成绩外，也实在无其他话可说。‘立即开始工作’，这就是我们目前应有的精神面貌！”在这封信中，侯老师还给我们布置了大量工作。他说：“四川土研室现在想开展的工作和已经开展的工作有下列五项……”侯老还提出了室内分析的筹备工作建议共计三条十四项。看了这封信，我不禁汗颜！因为我们住在家里，被动地等待重新发落，仍然领全额工资。而侯老以他年近七旬之身却在简阳农村蹲点，以他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土壤研究工作和建立土壤研究室之不可憾缺。侯老这封信就是对我们的批评和鞭策！

直到1980年土研室才在成都建立。直属四川科分院领导。侯老师仍任室主任。我因种种原因未去成都。最初他为此曾表示遗憾。之后，却认为我留在西南农大任教是明智选择。虽说侯老是土研室主任，但他仍是西南农大的教授。我仍有很多机会去聆听侯老师的教诲，共叙师生情谊。

由于原土研室的大部分同志都离开西农了，我随时想到我还是侯老的下属。他每次由农村返校我都要去看他，向他请教和他聊天。侯老常对我说，要随时随地想到土壤；甚至屙屎屙尿都要想到土壤；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它的发生学原理（即产生问题的原因）。他指教我说，你是搞土壤化学分析的，不能只搞土壤标本的分析，标本是死的，而土壤是活的。要考虑在不同情况下进行分析，尤其要重视不同温度情况下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最好是原态原位的测定（即在田间状态下测定）……搞室内分析也要结合野外调查研究。因为它是因时因地学习、总结农民经验的最快捷最好的办法。我牢记侯老的教导，在我后来对土壤酶、土壤电导以及结合半旱式耕作法和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等的研究工作中，都尽力按侯老指示的精神去做，总能得到新的认识和收获。我深深感谢侯老对我诚挚的教诲。

侯老对待科学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对待周围的同志，下属却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他说话风趣、随和以致像我这样的职低位微、历次政治运动都处于岌岌

可危处境的小人物，在他面前都可以“没老没小”地随便讲话。就是帮他做家务的小保姆都不怕他。我为自己在他面前毫无顾忌的随意态度，反嗔怪是侯老把我们惯坏了的。下面我讲点侯老生活方面的故事。

侯老爱开玩笑，常说一些让人回味几分才能懂的



侯光炯（中）与付显兰（左）、江育璋（右）合影

话，如侯老师叫侯师母“爸爸”，叫他的儿子“小祖宗”（孝祖的谐音再加个宗字），叫我“弟弟”，叫我爱人（也是侯老的学生）“姐姐”，叫一位经常陪伴他的出差开会的青年教师为“爷爷”，常尊称一位生活知识比较广博的老师为“博士”，称当时在土化系任党总支书记还很年轻的付显兰同志为“妈妈”。前面那些称呼我想都是他说的亲切的反话、玩笑话，这“妈妈”的尊称是什么意思呢？经过“脑筋急转弯”我终于明白，这一尊称是侯老从“党啊，我的母亲”，这一党组织深情的话语中衍生而来的！后来，我问侯老，你叫付显兰“妈妈”是不是因为她是代表党的意思啊？对我的这一演绎，他用认可的微笑作答。侯老的玩笑话也不是没有意思的哟！

侯老的英语很好,他可以用英文写论文,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专家随意交谈。他多次参加国际土壤学会,在国外考察和外国同行一起工作,都是证明。他英语好,但不迷信外国人和外国的科学,尤其是农业科学。他曾对我说,我们学外语是为了了解国外农业科学的发展情况,学习他们的长处,充实我们自己。你看到了就会知道,外国的农业生产并不都是比我们好,我们中国的单产是最高的。我们的农民是最聪明的。



1979年侯光炯(中)在四川安岳
为土壤普查技术培训班学员现场讲课

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志去看侯老,闲谈中,提到一个相声节目。两位相声演员耍贫嘴。一位演员说他会用英语说相声,一位说中国相声是语言的艺术,用英语不好讲,讲出来效果也不好,并打了一个比方说:狗撵鸭子呱呱叫。我问侯老师,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讲呢?侯老想了想,用一个纸条写下了这句话的英文。在座的同志都非常惊奇。可惜我没有把这个纸条保存好,否则可以让大家看看侯老的这句英语“相声”了。

记得侯老过八十岁生日时,我带上我的外孙去给他祝寿。侯老用上海话问:弟弟叫啥名字呀!我说梁田。良田沃土啊!你是土壤学家,为了祝愿我国土壤都成为肥美的良田,所以取了这一与良田谐音的名字。侯老听了非常高兴,让他儿子拿出二十元钱打发给我外孙。

六十年代初,文革之前,我第二个孩子快要临产了,名字还没想好。急切中去请侯老赐名。提出的要求是男女均可用。侯老沉思片刻说,就叫“瑞”吧,“瑞雪兆丰年”嘛!太好了。当时,正是雪花纷飞的隆冬季节,我生了个男孩,就叫“瑞”。在文革中,由于侯老被揪斗,有

同志好意地对我说,你儿子还叫“瑞”呀。我灵机一动说,是叫“瑞”,但已改成尖锐的“锐”了。文革结束后,我又将“锐”改成“瑞”,以纪念侯老。话说到这里,我再讲一个小插曲:1977年侯老受到过一次表彰。我们让还在读小学的瑞给侯爷爷写了一封祝贺信。不久(1978.2.1)收到一封从西农黄桷村14号(侯老住地)寄到西农土化系由我转交瑞的信。信中写道“家瑞小弟弟,给我的信写得很生动,也很有感情,使我爱不释手。想起我在您这样小的年岁时,还写不来信,更看不清问题,很羡慕您生在红旗下,受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茁壮成长,为少年一代的祖国儿童争光,真是多么幸福,多么可爱啊!”……

我们收到这封信很受感动。侯老在百忙之中还抽出宝贵的时间给一个小孩回信。鼓励他好好学习。这封信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次为纪念侯老,学习侯老,学校将开辟一个永久性展室,我们将此信随同侯老给我们的全部信件赠送给展室。让大家分享、领略侯老博大的胸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晚辈,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

我爱人由于眼疾双目失明多年了。侯老是绝不相信这眼病是治不好的。他几乎在每封信中都鼓励我们积极治疗,还介绍上海某医院可以用激光治疗青光眼。他在信中说:“我抱着万分乐观的心情,等着再和你(指我爱人)在野外过着一、二十年爬山涉水的生活哩”。侯老每次从农村返校,都希望能见到我的爱人。我们怕耽误他与其他同志商讨问题的时间,尽可能少去打扰他。有时他就让人搀扶着到我们四楼住地来。真让我们感激、愧疚无以言表。有一次侯老在成都川医动手术治好了白内障,高兴地到我们家来东看看,西瞧瞧。还到阳台,看看种的花。他指着一盆只长有杂草的花盆说,这是什么花呀!我笑着说,这是杂草,还没有开花哩。侯老眼神不好,多年来都没有真切地观赏花了,他认草为花,也是他风趣,幽默地故意“逗乐”我们。啊,这可敬可亲的老头儿哟!

侯老师对我的恩情是最难以表达的。当他知道我55岁就退休,心里很不了然。我解释这是政策规定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嘛。侯老来信说:“你到长宁来,我给你

留一套房间，你把老宋（我爱人）和你孙子都带来”。1991.12.20 的来信中，侯老热情的写道：“我们免耕所的新楼已经初步完成了建筑基地的工程。大约明年七月庆祝乔迁。竭诚希望你自己先来看一看。把你们喜欢的房间定下来，然后双双降临，共同为土壤学大发展贡献余生”。……1992.1.2 的来信中兴奋地写道：“最近张子先专员（为宜宾专区专员）组织成立一个规模很大的离退休干部科技协会……组织广大离退休人士干一番大事业。91 年七届人大会议期间，我曾给人大提过一个提案，详细说明离退休人员中有很大一笔智力资源，必须加以运用。后来人大回复了我的提案，表示非常赞同，并已着手考虑组织、待遇等问题。我虽然没有退休，人家也把我看成是死在旦夕之人。我不分昼夜，不论星期、例假都拼命工作，相信长寿办法只有“狠用脑筋”一条，所以常常以等死的人，还能做出大量的工作，自己感到长寿是有把握的，再活十年也不会懒下来。可是说也奇怪，有些外来的客人，把我和罗老师（注：帮侯老书写的一位同志）对坐苦干、看成是奇迹，看成是自讨苦吃。我现在只有一点希望，即如果我再干十年，平均每天干 8 小时至 10 小时，直到九十几岁死的那一天，还能象（宜宾）地委孙书记希望的那样：“自然免耕研究所是我国首创的，也是我国独创、相信你会在有生之年做到把研究所扩大为自然免耕研究院的”。侯老在 1992.3.9 的来信中也表达了希望我们能去长宁的愿望。信中写道：“我这个苦命的老汉……没有自己建造过这么大的房子，我要你们来看看，让你们也高兴高兴……。我这个研究所是将来三年到五年内，我们几位师生共同享受一点清福的好地方，……过了这个时期，你们会只见墓碑、永久不见我了。我们要好好照几张像，留念留念”……看了侯老的这封

信，我真的想哭！侯老在 1992.12.30 的信上说：“……现在我只能先向你透露两件事情：一件是准备 1994 年去墨西哥参加第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另一个是想办两个机构，一个是自然免耕科普博物馆，一个是‘四良’农贸开发公司。所谓‘四良’是指良土、良种、良肥、良法。很想借重你们两位……住到长宁来，送我寿终正寝，也帮我做一点工作”。1995.4.11 的信中还是在说：“……你们在免耕所工作，不管你七老八十都不让你退休，我句句说的是真话，你对我的真心一片，我对你们两位也是

真心一片，……我还要跑野外。你说我犟，我就是犟得很，实在比谁都犟，土壤事业是人类的命根子，就要我们一老一小来抚养它”。侯老师因我回信说要照顾孙子和双目失明的老伴暂时还不能去长宁时，他在



1990 年 11 月西南农大四十周年校庆期间侯光炯（右三）与学生们合影

1995.12.4 日的信中说：“为小孩子忙太不合算了，一个月只要花几十元钱就可以腾出功夫来写作，把我最亲爱的同志能够再贡献自己的学问，给世界人民受益，收受中国土壤学者的一点最忠诚的奉献，要想想他们是在饥寒交迫中随时向死神挣扎的穷苦啊！”这次的落款竟是“快死的九十老头儿”。看到侯老讲的这些急切、诚恳的话语，我真是无地自容，我怎能摆脱这私家的束缚呢！侯老是为了谁在没日没夜的干呢，从所摘抄的星星点点的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侯老完全是为了中国、世界的劳苦大众都能摆脱贫困，过上舒心的日子啊！

1996 年春节是侯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非常急切地说：我希望我在老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编三种杂志：“《生态农业大家谈》、《生态农业学报》和英文《土壤生理和自然免耕》，把我们的特点，特别是关于胶体热力学的中国土壤科学特点，传给世界的紧急时光，更需

要你来一个时间，半个月一个月均可。把娃儿也带来。今年过年，祝你们全家快乐”。

侯老师自从到长宁驻点，就不断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能去参加他主持的工作，我曾答应他，等孙子上学前班，我一定要去。直到他去世我也没能履行我的诺言。我心里十分内疚，感到太对不起侯老师了，我辜负了侯老对我的期望和厚爱。

有人问侯老，您为什么喜欢江育璋。侯老想了一下说，她是一个随便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的人。我非常感谢侯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钟爱。侯老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我觉得他一心扑在事业上，有时也觉得孤寂(1982.9.11的信)需要周围同志的关心，也需要人情味。所以，有时我看他，总是和他坐得很近和他谈谈闲话，让他绷得太紧的思想松弛一下。有一次侯老的儿媳邬丽华同志对我说，侯老过九十大寿回来，开了一上午的会很累，中午想休息一下，侯老招呼，中午任何人来都不见，江育璋来了让他进来。但那天上午和中午我都没有去，也没有打电话给侯老，我知道他老人家太累了，不忍心去打搅他。侯老88岁生日是在长宁过的。我只身一人坐了两天公共汽车去给他老人家拜寿。那天长宁县很多领导、四川科分院一些同志，还有提着鸡蛋的农民都来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给他表演节目。晚上长宁电视台为侯老播放了很多他最喜欢的郭兰英演唱的民歌。侯老过得很开心。第二天，侯老又给我谈了很多他对工作的设想，希望我再进一步做些研究工作，甚至希望我投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说侯老，你忘了我的年纪了吧。侯老说，别管那么多。开车的时间快到了我起身告辞。看着侯老那突然显得孤寂的眼神，我忍不住俯下身去亲了他的面颊，他也亲亲我。尽管我听到了一个从门口传来的笑声，我还是用双手紧握侯老的手。我是想安慰一下他老人家的心，他不是孤独的，他身边有长宁免耕所的同志，当地的很多农民朋友也常去看望他，向他请教，讨论问题。他的儿女也经常去信和到长宁去陪他。还有很多像我一样关心他的学生，也常去信问候他。向他汇报，求得指教。我唯一对他老人家的祝愿是多多保重。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做更多的工作。

侯老 1996年10月下旬从长宁回来的第二天就住

院了，但没人告诉我他住院的事。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到他家里，都没人接。直到10月28日才和其他同志一道到西南医院去看望侯老。进入病房，邬丽华同志就告诉我，侯老在问怎么江育璋没来。啊！侯老师，我不知道您住院了，我来晚了，太对不起了。看着他虚弱的身体，我强忍心里的酸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他问好。有同志说，侯老，好好养病，过几天再来看您。侯老笑着风趣的说，我过几天就出院了，我不愿你们到医院来看我。我接过话头说，我也不愿到医院来看您。过几天，我到您家里去看您。侯老显得很高兴，临走前，我和付显兰同志都俯身下去亲了亲侯老的手和他道别，侯老面带微笑，目送我们走出病房。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侯老去了，相信由侯老开创的以土壤胶体热力学观点为主线的中国土壤科学定会后继有人。侯老师，您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科学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我们将永远怀念您。您对事业忠贞不渝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大家。您的学生将永远以您为榜样，做劳动人民的孺子牛，勤奋耕耘，换来全国锦绣山河，肥美良田！

侯老师，安息吧！

1996.12.15



侯光炯(左一)亲切访问农民

(责任编辑：郝龙)

七律三首

赠侯光炯教授

□文/张继文^①

1983年8月



1943年5月21日侯光炯
在甘肃定西考察时的画作

1983年8月1日—6日，侯光炯先生一行四人来兰州考察黄土高原土壤情况，并进行学术交流。当时我是甘肃土壤学会秘书长，受学会委托，负责接待工作。侯老又是我1955—1959年在西南农大（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土化系学习时的老师，迎来送往及相陪考察的六天，写下了这组七律，以赠侯老。

一、相逢初叙

久别重逢在异乡，师生欢聚述衷肠。
互询别后酸甜苦^①，同忆当年麻辣香^②。
共赞今朝改革好，俱知任重征途长。
夕阳晚照献余热^③，夺秒争分惜寸光。

注：

① 59年一别，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动乱之苦及粉碎“四人帮”后的甜。

② 川味特色“麻辣香”。

③ “献余热”系指当时侯老年近八旬，尚在四川宜宾地区开展“半旱式土壤耕作法”的实验。

二、皋兰山上

驱车绕道上皋兰，沟谷相连尽土山。
引水黄河高百丈，护渠绿树长千竿。
层层梯地换新貌，户户农家展笑颜。
喜看侯公精力旺，登山察土首当先。

注：

①皋兰山，位于城之南，山顶已开辟为“南山公园”，山之背坡，坡度较缓。在“农业学大寨”时期，修成梯田，从黄河引水上山，修渠浇灌，改变了南山面貌。8月2日，侯老上山察看黄土的有关情况。

^①作者系原甘肃省科委山区开发办公室主任、高级农艺师。

三、考察黄土

察土登高仔细看，分层采样^①解疑难。

稀疏植被多蒿菊，致密母岩系马兰^②。

坡陡土干腐殖少，冬长温低易春寒。

伏耕广纳三秋雨^③，墒足苗全绿满山。

注：

①选点挖土壤剖面，并分层采集土壤样品，进行各项有关数据的分析。

②马兰，指其母质为马兰黄土。

③伏耕是当地的耕作方法，指夏收之后的耕翻晒地，便于接纳雨水。

四、黄河岸边^①

滔滔激浪向东流，无限风光眼底收。

白塔抬头迎远客，铁桥展臂任君游。

天连碧水群芳秀，树掩青山一叶秋。

欲问黄龙何自得，梯梯电站照神州^②。

注：

①8月3日侯老一行从中山桥过黄河去大沙坪考察兰州特有的“砂田”。在中山桥上观赏黄河景色。

②黄河上游已有龙羊峡、刘家峡等电站，拦河筑坝、蓄水发电，变水害为水利。

五、砂田^①辨石

铺石田中好种瓜，增温保湿早开花。

石成四面冰川石，家有三砂富裕家。

色石琳琅添异彩，诸砂灿烂放奇霞。

农家抗旱凭勤劳，一亩砂田千担砂。

注：

①砂田“抗旱耕作法”，在平整的土地上，铺一层厚约20公分的砂石，起增温保湿作用，现已被地膜取代。

六、寒舍赐教^①

蒙师学友入寒门，欢聚一堂格外亲。

君子兰开迎贵客，仙人掌合敬嘉宾。

韶华易逝情长在，岁月难留谊久存。

教诲谆谆铭肺腑，别来无日不思君。

注：

①8月4日邀请侯老师到家做客，正逢君子兰、仙人掌开花，我们摄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留念。

七、大楼讲学^①

五楼讲学会群贤，讲学传经欲尽言。

土壤普查为改土，田间诊断好肥田。

分区三化夺三宝，定点八方用八连。

跋涉多年勤实践，谱成农业土壤篇。

注：

①8月5日，甘肃土壤学会安排在省土肥站五楼会议室讲课，“土壤分区”、“三化”、“三保”、“八连”均是侯老土壤改良、诊断、培肥的专业术语。

八、依依送别^①

行期既定急南飞，临别依依泪欲垂。

馈我一尊无量佛，赠师两盏夜光杯。

安排欠妥多原谅，饮食不周拱手赔。

别后盼师常指教，信函电话借传媒。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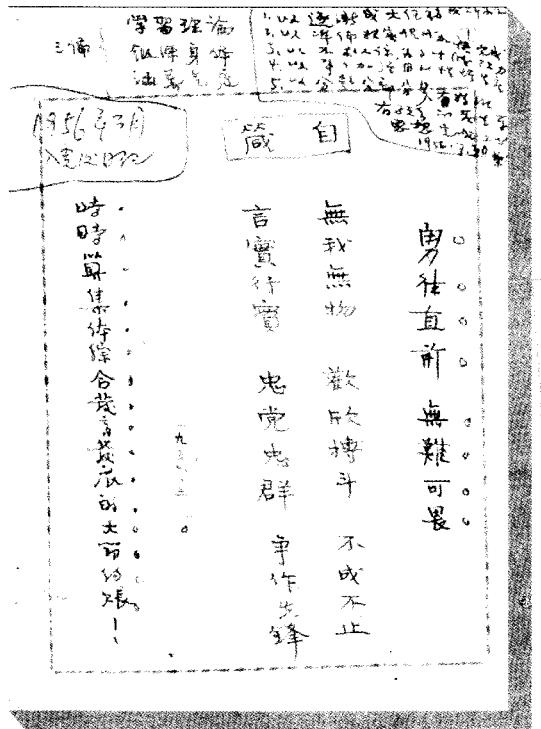
①8月6日，侯老一行离兰，乘飞机返成都。临别时，我送他一对甘肃酒泉玉雕“夜光杯”，侯老送我一尊“弥勒佛”工艺品，要我“笑口常开”、“大肚能容”之意。



(责任编辑：刘广生)

侯光炯日记(选登)

编者按：侯光炯教授一生有记日记的习惯，目前档案馆已收集到侯老入党后心得、工作记录、考察心得等9本日记。本期《名师风采》特选侯光炯教授入党后日记数篇，从这些日记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党对人民深切的热爱，对工作的探究反思，对土壤事业的执着追求。



1956年侯光炯日记扉页



侯光炯精心备课

1956年3月8日 小雨

我对土壤科学虽是很努力，但究因正式工作还刚刚开始，性质又不很易为人家了解，人民未体味到这种科学的实惠，所以群众对它没有感情。想了又想，觉得这一点反映应变为鞭策我启发我的最大力量。办法有两个，牢牢记住吧。

1. 尽力想怎样和生产结合，创造财富。争取明年能有10个重要的成绩，在发言中提出来，启发群众重视科学。

2. 从自然规律中深入的想，争取明年能有一种创造，可以被大家享用。

1956年4月13日 晴

到现在为止，大家自问得到些什么，人人还是模糊的，队伍得到些什么，也还是模糊的。一天又一天地忙忙碌碌，没有得到应得的结果，主要是工作方法上有两大缺点：

1. 没有抓住纲领：例如全队需要一张勘测表，许多典型剖面说明书，进一步工作方法大纲，我自己需要做三篇论文等。

2. 没有抓住时间：手被占了应该用脑，脑被占领应该用手，手脑都没有被占时就应该手脑并用。手脑都疲倦了，或是一样疲倦了，都应当让它有休息的时间。不然活一辈子都是糊涂的。

老天给每一个人同样多的时间，同样多的食品，同样可用的身体和脑，不要仅活着吃饭，变成万牲园里一个忙碌的小猴子，或终日酣睡着的老虎。

1956年4月8日

我的一个挂表，阴

是走得快一二分或慢二三分，换了，总是免不了偏差，到今天终于被准了。经这一点，我体会到我思想上的左倾右倾，正如表的快一点慢一点一样，不是想通了，就是想过了，就是想不到。

当然我惟有坚持着拨机关——要拨到标准，只是努力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思想关键，是

1. 与人为善，对人仁慈，要由衷，要本质，不要做作。

2. 对人对物对事，侦察敌情一样，自己多设疑难自己解答，不要有沾沾自喜和急躁不安的情绪。

侦察敌情一样，自己多设疑难自己解答，不要有沾沾自喜和急躁不安的情绪。

1956年7月13日 晴

遵守自己的年计划、日计划，必须利用一分一秒的光阴，做事三实——理论、身体、气度，苦思苦干，百折不挠的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永远记住：共产党从来不说一句空话，革命是以血汗实际换出来的，他只用这些实际说话。我必须用血淋淋的真实贡献来影响千万群众，裨益千万群众，团结千万群众。只要是血淋淋的真实贡献，纵是一滴一点，也能发出无限的光辉，生出巨大的力量。空话是可耻的。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访侯光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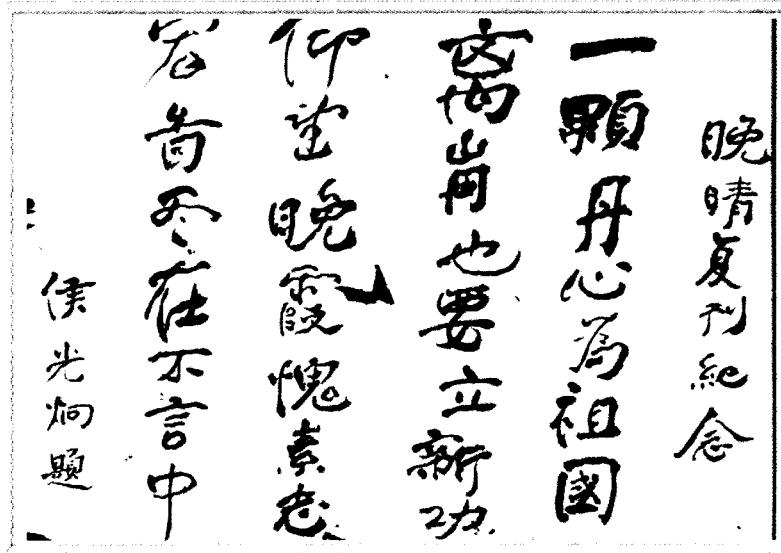
文/刘耀辉①

站在记者面前的这位戴着深达二千四百度的眼镜，银丝满头的老教授，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姓侯名光炯。他头上至少有二十多项“帽子”，诸如国际土壤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土壤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科技顾问团成员、西南农学院教授等等。侯教授是一位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跟随他的助手们在进行农业科研讨论后的空闲时间，举行了一次“侯老师性格研讨会”，结论是：“侯老师性格诸侧面的结晶体——怪。”在哪？

“怪”言惊众

1981年夏天，长宁县相岭山乡。

风阵阵，抖动着冷烂田条条垄埂上的秧苗，拂皱了行行垄沟水。



侯光炯题字

参观者瞠目：“水稻水稻，稻子离不开水，这稻子长在干埂子上头，会不会干死？”

侯教授：“不会。”

参观者：“垒了这么多垄埂，怎么犁田？”

侯教授：“不犁田。”

参观者：“农谚说：‘七月犁田一碗油，八月犁田半碗油，九月犁田光骨头。’侯教授，你怎么看待这条谚语？还需不需要精耕细作？”

侯教授：“我们扔掉了‘七月犁田一碗油’，自然扔掉了现行耕作的精耕细作，因为，我们正在试验研究一套新的耕作法。”

参观者微怒：“对待几千年的耕作传统，要不要尊重呢？”

侯教授激动起来：“岂止是不尊重，是背叛！我承认，我是个怪人！”

他满头银丝在颤动，手一挥，

① 刘耀辉，高级记者，现任职于四川日报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学客座教授、新闻硕士研究生导师。

走了。

参观者望着侯教授远去的背影，议论纷纷。

“嗯，侯教授喝醉酒了吧？”

“听说他不喝酒呀。”

“嗯，好个‘怪球手’。”

春节逐女

新的耕作法在试验中，不少人仍视之为“怪物”。冬去春来，1982年春节将到。

侯光炯教授从相岭基点试验室回到住房，脸色沉凝，威严地对弟子们说：“春节快到了，我命令，用完成论文的行动来欢度佳节。现在，我点名，留下来在基点写论文的有……”

弟子们睁着吃惊的眼听着。

“不要大惊小怪的！”侯教授大声说，“刚才我点了名的，要是愿意留下来写论文，那就继续当我的助手，要是不愿意，就不算我的助手，何去何从，听便！”

被点名的人，想着失去一年一度回家过节的机会，未免不快，但严师的命令又怎能不服从呢？

“报告侯司令！”调皮的助手向侯教授请示，“您的幺女儿从桂林来到相岭，是不是执行命令，撵走？”

“撵！”侯教授没有被逗笑，板着面孔。

这些天，侯光炯接到在外地工作的儿女们的一封封来信。信中提出合家团聚欢度春节的要求，供父亲优选的方案有两个：“一、父亲离开长宁县相岭区科学试验点，到儿女中的任何一家去过节；二、第一方案如不行，则由儿女们来到相岭区共度佳节。”侯光炯挤出几分钟时间，用“电报体”的信作答：“春节我不离开相岭，也不准你们来，切切。”

谁知道幺女儿不听令，千里迢迢从桂林跑来了。

门开了。幺女儿一手抱着桂林糖果、腌腊肉，一手牵

着侯教授的外孙女进屋。

“爸爸！”幺女儿亲热地叫。

“爷爷！”外孙女奶声奶气地撒欢。

侯光炯怒责幺女儿：“哪个叫你来的？春节，我忙，你来破坏我的工作！”

“我……”

“你走！”

女儿禁不住抽泣起来：“爸爸你搞科研，不要命，我没意见，可你不能不认女儿了呀，不能不认外孙女了呀……”

侯教授的眼眶也潮湿了，但他蓦地发现自己的感情“脆弱”，于是硬着心肠说：“春节，团圆，合家欢……我觉得这些，是累赘！它，侵略时光，罪该万死！我写信给你们几姊妹说过，我的工作忙，叫你们都莫来。唉，你太犟，这一来，影响我干事情！”

“爸爸！我早作好了思想

准备，不是来要的，是来帮助做一点抄抄写写的工作嘛。”幺女儿解释着。

在助手、区干部的再三劝解下，幺女儿作为“工作助手”被留下了。

子夜已过，一元复始，小镇上的鞭炮声停息了，幺女儿和区干部催侯教授休息，他勉强地把论文草稿收拾起来，关灯上床睡觉。

幺女儿走出房门，一位助手对她逗耳朵：“保管今晚上侯教授还要写论文。”

“关了灯，上了床，怎么写？不会吧？”幺女儿奇怪的问。

“睡在床上写，写在大脑稿笺上。”

“啊！”

助手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比方说，侯教授有一天凌晨一时半上床，一早就爬起来。他连脸都顾不上洗，便叫助手展开稿笺。他取下眼镜，口授着：“土壤发育过程进入农业土阶段以后，农业生态系统各组分之间的矛盾，较自然土阶段大大的尖锐化了。



侯光炯与小女儿于相岭免耕所

不合理的耕作法，往往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酿成恶性循环，农业土壤的研究必需面对这些问题……”“现在，我们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助手停笔，打岔：“侯老师，你出口成章，是晚上在床上打了腹稿吧？”侯教授笑着答：“你们强迫我上床睡觉，嗨嗨，管不到我睡在床上动脑子。嘻嘻，我的稿笺装在脑壳头哟。”

今晚哩，他又在脑壳里的稿笺上写文章吗？没有。他在床上“作检讨”。

踏、踏，脚步声强劲有力，侯光炯教授行走在仁寿县农村，一湾湾水田展现在他的面前。

“侯教授！我们乡的冷浸田、深脚田、烂泥田，又深又冷又毒，一年种一季，产量又很低，大家都叫做包袱田。你有什么科学办法，帮我们甩掉这些包袱吗？”仁寿县的一位农民在五十年代向他发问。

“现在还没研究出好办法，我检讨。”侯教授坦率地回答，心情沉重地低着头。

喳，喳，喳，衣着朴素的侯光炯教授行进在简阳县农村。

“侯教授，你是土壤学家，能不能给冷烂冬水田开个治疗处方？”简阳县委负责同志期待地望着侯教授。

“现在还没研究出治‘包袱田’、‘拖腿田’的成熟办法来。”侯教授难过地说。

沙，沙，沙，粉碎“四人帮”后，发丝已白的侯教授行进在成都。

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赵紫阳同志对他说：“全省低产冬水田少说也有一千多万亩，占耕地面积不小，从全国来说，它占的比重也较大，怎么改造？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不可以作一作实验研究呢？”

“这些年，我也知道这个重要课题，在进行研究，可就是……”侯光炯停了停，语调由沉缓变为亢奋，“我保证，在有生之年，一定竭尽全力，有所突破！”

……

天亮了，大年初一，幺女儿进门请安。

“爸爸！你昨晚没睡好吧？”幺女儿不安地望着爸爸的满头银丝和一脸皱纹。

爸爸答非所问，激动地说：“自然免耕！改造低产冬水田！我，没有老！我年轻！”

“爸爸！看，你又激动了，过分激动，伤身子啊。”

“呵，我承认，我在土壤妈妈的面前，爱激动。而对你们几姊妹，我缺乏激动。”侯光炯望着幺女儿，“你妈妈去世几年了，我一年到头跑农村，没有跟你们好好团年……”

幺女儿眼圈发红，低头听着。

“这些年，我没有管你们，让你们放敞马，我……”侯光炯喉头梗塞，停了停，又难过地说，“我没有挑起哺育儿女的担子，我不配做你们的父亲！”

幺女儿不语，泪珠儿在眼眶里颤动。

“我检讨！我这个该死的爸爸，当众教训你，骂你……”

“不！爸爸，你是好爸爸！你老人家把时间，把精力，把金钱，把感情，都交给了科研事业，当女儿的，怎么能怨你呀，爸爸！”

侯光炯转身盯着助手和区干部，面带愧色地说：“我也要向你们作检讨！国家规定，春节放假，可我留你们来工作，这是错误的。我，对不起你们！”

“侯老师！我们都理解你，你是要抓紧时间，突破旧耕作制，研究出新办法来呀！”

泪水，从老人和年轻人的眼中汨汨涌出，这是两代人心灵之泉的交流。

赔钱风波

相岭山乡，交通不便，但“口传”新闻并不比电传新闻来的慢：有些乡的自然免耕试验田减产了！侯教授和试验基地点的人要陪产了！

“减产？”助手和县、区干部们的脑中划着问号。

“减产就减产。”侯教授是个直性子的人，爽快地说，“我赔钱。”

怎么能由侯老师赔钱呢？弟子和区干部们都知道，他虽说每月有330元的固定工资，外加稿费，但月月都“赔”光了。

自1980年来到相岭区建立农业科学试验基点时起，他常在山沟里转。他看见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吃饱肚子了，衣服穿暖了，零花钱也渐渐多起来，眼睛都笑成豌豆角，连连称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真好啊！”同时，他在走村串户中也看到，不少农民还

住着旧草房，肉、蛋吃的少。他感到揪心似的疼痛，非常难过地说：“我是农业科研工作者，我对不起农民群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种执着的感情使他一发现哪家农民生活有困难，便掏出钱来，诚恳地说：“不要见外，我‘赔’你。”有的农民婚丧之事缺钱用，他又掏钱相赠：“我欠你的账，‘赔’！”乡、村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他也主动“赔”钱。区干部心情不安地说：“侯教授呀，你成了富有的穷人！”

侯光炯听到这些话，反而心情沉重。他对区干部说：“请别误解，我不是恩赐农民，只是看到群众缺钱，心里不好过……我欠了农民的账，因为我是研究土壤学那么多年的农业科学家。”

他心里象揣着一团火，泡在冷、烂、深的水田中从事新耕作制的试验研究。然而，现在有些乡、村的科学试验地“减产”了。他赔了钱，但心情并不因此而轻松。他缓步行走在雨中，在乡间小路上。

“回屋去休息吧，侯老师！”助手充满深情地对他

说。
多好的助手啊！他默念着一个又一个名字：莫先武、龙再忠、黄绍贤、郎家文、龚仲篪、周沅芳、鲁宗仁，他想起了西南农学院那些他叫的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学生，他们都为新耕作法绞尽脑汁，躬身实践。然而，眼巴巴期望的新耕作法，却在一些地方失败了。

“莫伤心，莫难过呀，侯老师！您老的脸色不好，头上又添白发。回屋吧，提防受凉哟。”助手苦劝着。

“凉？……凉倒没什么，只怕凉了冯书记、张专员他们的心。”侯光炯的目光伸向山峦起伏的远方。

热切的词语，还在他的耳边回旋……“侯教授！欢迎您来宜宾地区搞试验。”“地点，随您选。条件，任您提。我们地委、专署万事开绿灯！”“我们已经给各县的负责人打了招呼，当好您的后勤部长。您要什么，给什么，来吧！”宜宾地委冯书记、专署的张专员，一次次向侯光炯教授诚恳地表态。“我不要任何条件，只求把我当成相岭人！”侯光炯来了，落脚在土壤种类多的长宁县相岭区蹲点从事科学试验。相岭区委副书记罗仲林代表区委、区政府说：“侯教授！区级机关的两幢楼房，给你一幢，作你的宿舍、办公室、实验室……还需要什么，尽管说，我们一定照办！”……

“减产，失败，我是罪魁祸首！”侯光炯凝重的目光落在助手身上。

不久，相岭山乡又传开了另一则消息：经各方反复核实，

1982年5月侯光炯教授
四川宜宾相岭蹲点留念

大多数用新耕作法种的试验田，增加了一季作物，稻、麦两熟，增产显著。少许农户种的试验田“减产”是因为少报产量，或者没有按新技术措施办，或者抽走了肥料。

有的助手火了：“不象话！应该追回赔款。”

侯教授伸出右手：“不要说了，不能伤群众！怨我，没有把工作做到家。”

在这样一个袒露着的崇高心灵面前，助手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初胜的喜悦没过多久便被新的忧虑所取代：省、地、县拨来相岭科学试验基点的经费快用完了。没有钱，新耕作法的试验就不能不终止。

“怎么办？”助手们问教授。

“怎么办？”教授自问。

挣脱缰绳

好消息传来了，省上及时拨来了款。

“衷心感谢省委、省政府！”侯光炯像淘气的孩子，笑着，叫着，闹着。

相岭山乡沉浸在欢乐之中。

“经费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钱，还有，要珍惜每一寸光阴。”侯教授收起笑容，严肃地说，“要跟上世界技术革命的步子，我们相岭科学实验基点就要搞



八二

侯光炯

1982年5月

四川宜宾相岭蹲点留念

侯光炯

‘快节奏’！”

什么样的“快节奏”？侯光炯首先在自己的身上种开了“试验田”。早上，他六点钟左右醒来，在床上思考一天的工作安排。刚一下床，他便呼喊助手：“你今天的事么，到试验地；他写，完成……”早饭后，他来往于试验田、实验室、工作室之间，时而在田边作技术指导，时而在课堂对科技训练班学员讲课，时而跟助手们讨论研究“自然免耕”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他还要在外地参观者的包围之中，不厌其烦地宣传“怪异”耕作法在破除传统耕作制上的“革命意义”和具体技术措施。

晚饭后，“快节奏”达到高潮：助手、区干部、学生纷纷涌进他的卧室，抢先汇报一天的工作情况。

夜深了，他展开稿笺，让助手笔记他口授的实验总结。

.....

日历一页又一页地翻去，侯教授熬病了，血压急剧升高，眼花头痛，服药无效。助手和区干部们劝他到大城市去住医院，他坚决反对，理由充足地说：“越治病越坏事，不治自好。”

助手们悄悄议论：“这叫‘自然免病’法。”

区干部也小声发表看法：“侯教授太古怪，硬是个怪教授。”

侯教授听见了悄悄话，神情严肃地说：“我不否认，我是个怪教授。不过，我刚才说的结论是有事实‘数据’的。”

那是1976年夏季，他在简阳县农村从事科研工作



1973年侯光炯(中)在四川简阳与农民讨论棉花高产的土肥管理

时，胃部胀痛，食欲不振。省内某医院通过种种方法诊断，他患的是“晚期胃癌”。

省里有关部门派护理工作人员送侯教授到上海，进一步做诊断和抢救。省委负责人亲自写信给上海一家有名的医院党委，希望指定高水平的大夫对他治疗。上海一家大医院派了一位具有国际威望的大夫，对他进行诊断治疗。通过透视和化验，仍未否定“晚期胃癌”。处方是：迅速开刀。

“侯教授！医院决定，明天开刀。我主刀，请您配合。”大夫来到病房，郑重地通知他。

“我不开刀！”侯光炯语气坚定。

“什么？你不开刀？”

“对！我不想开刀！如果您拉我上手术台，我马上跳下来！”

“你，侯教授，简直令人不可理解……”

这位担任主刀的大夫，外科手术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是每一个患者都有幸由他主刀。他怀着尊敬土壤学家的心情，主动到病床前向侯教授表示亲自主刀，却碰上了一鼻子灰。

侯教授的儿女们从全国各地赶到病床前，苦苦劝说着：“爸爸！爸爸！服从医院的决定吧。”

侯光炯额上的青筋直蹦，火冒三丈：“我，不开刀！不开刀！”

儿女们跪在病床前，低着头，泪流满面，齐声轻轻喊：“我们，不孝的儿女，请求你老人家开刀……”

“我，我也要跪倒请求你们——我的‘祖宗’们，去阻止大夫向我动刀！”侯光炯同样洒着泪，对儿女们呐喊。

儿女们浑身颤动，说不出话来。

侯光炯渐渐平息下来，病房的玻璃窗好像变成了一方方明晃晃的巴蜀水田——冷浸田、烂包田、深脚田，在呼唤着卧病的老人去改造。他擦了擦泪，恳切地对儿女们说：“如果开了刀，我最多在病床上躺几个月，一年，当个饭来张口的残疾人。与其这样，还不如用这有限的时间，回到土地妈妈那里去，在水田边向你们告别……”

身患“晚期胃癌”的侯光炯教授，在手术刀晃动的千钧一发之际，挣脱了上海某医院的“缰绳”，迅速“逃

走”了。

“晚期胃癌”莫名其妙地在强者面前退让了，他居然活着回到四川，在川南相岭农村重操旧业。

此刻，高血压“病魔”也败退了。侯光炯在向门外大声吼：“喂，有人吗？快，快来记录！”

“来啰！”一位助手在走廊上高声答应，冲进屋里，手忙脚乱地寻出稿笺，掏出钢笔。侯教授口述：“经过相岭基点同志们反复对比免耕与翻耕对土性的影响，才知道免耕的最大好处，是使土壤在长期不断浸润的情况下，长期或较长期地维持优良的结构，利用结构的优势消除可能发生的水、热、气、肥矛盾，减少……”

他呷了两口茶，继续口授：“半旱式耕作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免耕增产，翻耕减产……”

“我们研究的免耕，和美国免耕法不同之点在于：一、本法一次免耕可以……”

“因此，我们特名本法为自然免耕。”



1983年侯光炯(前一)在长宁相岭盆栽场观察

和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市的农业专家、教授、工程师到相岭作实地观察。他们——全国性的“水稻半旱式栽培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听取了侯光炯作的《大力推进自然免耕法在经济和科学上的重要意义》的学术报告。会议“肯定了半旱式耕作制在生产上、科学上、经济上的效率为农业综合研究找到了以高产技术为大组装的新路子”，“建议由中央农牧渔业部和四川省科委组织有关部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进行合作攻关，(在1984年四川省已推广17万亩多的基础上)扩大中试，在全国普遍加以推广，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淡淡的晚霞，透进相岭山谷侯光炯教授的住室，映照在年过八十的老人身上。他头上又添银丝，脸上皱纹越刻越多。老了，老了！教授想起在北京，在长沙，在成都的儿女们的来信：“到城里来度晚年吧！爸爸！”“爸爸！您在城里，也可以搞科研呀！”“爸爸，您快点决定哟！”

决定？是呵，得决定！

侯光炯从事紫色土研究已五十载。早在1935年他就到英国出席了“第三次国际土壤会议”，用英语宣读了《土壤生态和它的生理》的学术论文，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五十年来，他用中、英文写作、发表了《土壤的粘韧曲线》、《中国农业土壤概论》、《土壤学》、《水稻土生理分类》等论文和专著。教授心血的结晶已超越国界，变成了无从计数的财富。耄耋之年，又和助手们研究出《自然免耕论》——难道这就是半个世纪土壤研究的压卷之笔吗？侯光炯在相岭山乡的陋室里，踱着蹒跚的步子，思考着……

土壤科学通向高产稳产的道路走完了吗？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完成了吗？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科学了吗？相岭的农民都富起来了吗？我能离开正在培训的科研生了吗？……

清江无尾

清江旁幽静的古老小镇——长宁县相岭，而今变成了闹市。省内外科研和农业部门的同志涌进了小镇上的“自然免耕展览室”，然后又变成无数支箭头，射向相岭农村的一块块“自然免耕田”。

行家们望着冷、烂、毒冬水田垄梗上的茂盛庄稼，感到奇怪，连珠炮似地向侯教授和助手发出了一个个问题。

“你们治理冷、烂、毒冬水田的诀窍是什么？什么叫做自然免耕？怎样自然免耕？永远不再犁田了吗？不犁田，杂草生，能高产吗？有什么理论根据和意义？”

侯光炯、助手和县、区干部对答如流。

1984年9月下旬，农牧渔业部、中国农科院土肥所

“决定”，谁不关心侯教授的决定啊！

西南农学院的干部、师生私下里做出决定：“请侯老师回院研究工作，只要人一回来，就不要他走。”

四川省科技、农业部门的同志决定：“请侯教授来省城参加重要会议。‘大会’、‘中会’、‘小会’，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开，让他在成都的女儿啸宿家定居。”

尝到新耕作法甜头的相岭区农民碰到一块，也作出决定：“我们去找侯老师，齐扑扑地站到他面前，央求说：教授！您在相岭的科研任务，已经完成了，该走了。我们相岭人都来送您啊。”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侯光炯的决定！

他——八十岁的农业科学家，八十年代的“怪人”，终于轻轻展开横格信笺，向省委书记写下了自己的决定——

汝岱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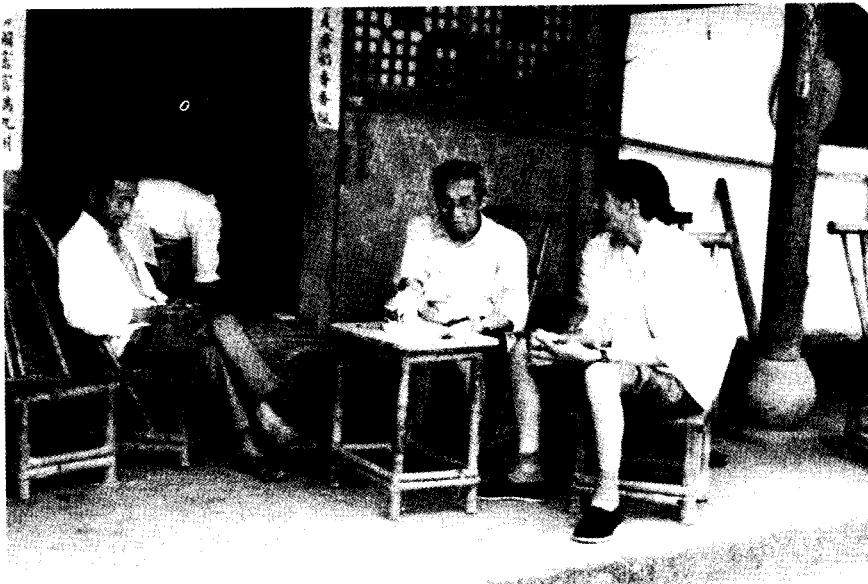
……(我)决定继续在土壤类型复杂多样的长宁县相岭区，扩大各项研究成果的示范推广工作。

总的来说，我决心充分利用短暂的余生，……利用土壤生理分类、农林植物土宜和“自然免耕”技术研究的新成就，广泛开展实验示范工作，促进农业丰收……

侯光炯 敬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

他还在一张张稿笺上写道：



1986年侯光炯(中)在相岭免耕试验农户家向农民“取经”

“我决定，利用自己短暂的余生，把新的‘自然免耕’(农田生态免耕)推广到全国。”

“我决定在科学攻关大协作的过程中，和全国土壤界同行、同事们，以及相岭十万群众一起，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决定，和同志们一道，把中国农业科学之光，透射到世界去。”

“我之所以做出这种奇怪的决定，因为，我是党、祖国母亲的儿子，是炎黄子孙。”

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来到相岭山乡，热情地握着侯光炯教授的手说：侯老！您好！您是党的财富，是国家的优秀知识分子！

手，一双双从祖国各地伸来的温暖的手，把他那散发出紫色芬芳的手紧紧地握着。

“侯老师！您是国之瑰宝！您是辛勤劳作的蜜蜂！”来自首都北京的中央农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握住侯光炯的手，不停地摇动着。

“尊敬的侯光炯同志，您这样品德高尚的人，您这样学识渊博、贡献大的人，少有，少有！您是科学家的代表，您是中国人的骄傲。谁说您怪？您不怪！”一位农业科学家向侯光炯教授伸出敬佩之手……

此刻，1985年初春，绚丽的晚霞给清江涂上了金色。江水蜿蜒伸展，不见尽头。

侯光炯教授手舞科研仪，目光炯炯，直视弟子们：

“听着！老调重弹——能跟上我的科研步子的，留！”

跟不上趟的，走！”

他的声音，在相岭山谷久久回荡。弟子们惊抬头，满目青山夕照明。

(选自《四川科技精英》第一集，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 9 月)

(责任编辑：刘沐璠)

改革开放，造就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我的父亲刘兆吉

□文/刘重来 ①

编者按：一位风华矍铄的老人，一名执着圆梦的行者，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他，就是我国美育心理学的创始人，在与祖国一同历尽磨难过后的古稀之年里，笔耕不辍，激情洋溢，为后人创造出了绚烂至极的学术之美。



刘兆吉先生(1913—2001)

2001年11月3日，已88岁高龄的父亲刘兆吉正在书房伏案写作，突然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3天后去世。父亲所在的西南师大(现为西南大学)成立《刘兆吉文集》编委会，整理、编辑他生前的学术成果。然而使编委会同仁十分惊讶的是，父亲一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成果，几乎全部产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但要知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之时，父亲已是65岁的老人，早已错过了学术研究的最佳年龄段。然而改革开

放的号角，唤起父亲多年压抑在心的激情和活力。从65岁到88岁的23年间，成了他学术上“激情燃烧的岁月”，造就了他一生学术最辉煌的阶段。

(一)

父亲刘兆吉，是西南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美育心理学创始人，四川省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关于他的学术成就，《刘兆吉文集》编委会有一段概括性的评述：

刘兆吉教授在美育心理学、文

① 刘重来，西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艺心理学、教师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等学术领域都有很高造诣，硕果累累。特别是他创建的美育心理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里；不仅在今天，而且对未来人类心理学事业的崭新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他为发展有鲜明中国特色，也具有充分世界性价值的心理学事业，做出了坚韧而独特的，功不可没的贡献。……刘兆吉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是西南师范大学与国际学术水平接轨的一张富有特色的品牌，永远都值得提及和宣扬。……刘兆吉先生在学界树立的坚韧、创新、谦逊的美好学者形象，永远令我们肃然起敬。^①

然而父亲的学术成就和改革开放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父亲却经历了漫长而坎坷的艰难岁月。

(二)

父亲出生在山东青州一个偏僻闭塞、只有 30 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潘村，家里世代务农。那里群峦叠嶂，土薄地贫，当地农民虽然起早贪黑地干活，却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祖父为了全家生计，在农闲之时，多次闯关东下煤窑挖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祖父又远赴欧洲当华工，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挖战壕、筑路、背炮弹，九死一生回来，攒了几个钱，供我父亲和伯父读书。

那时家里虽然穷，但祖父祖母却懂得一个道理：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出息，才有出路，才能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所以他们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因此，家里生活虽然十分困难，但父亲还是读完了小学，又考上了初中。但勉强读完初中后，家里实在无钱供父亲上高中了，父亲就去考不交学费，还有伙食补贴的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教了 3 年小学，1935 年又考上了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读书。

谁知刚上了两年大学，1937 年 7 月 7 日抗战爆发了，北大、清华、南开被迫举校南迁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父亲参加了由部分经济较困难的男同学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从长沙步行三千五百里到昆明。父亲在沿途采集了两千多首山歌民谣，汇编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商务印书馆 1946 年出版），父亲的老师闻一多、朱自清、黄钰生都热情洋溢为此书

写了序言，这是父亲出的第一本书。

1939 年，父亲在西南联大毕业，来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工作。开始只是一个小职员，工资十分微薄，母亲从山东逃难到重庆，一时也没有工作，家里生活非常拮据。我和哥哥出生（我俩是双生子）之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一下增加二个孩子，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可想而知了。这还不算，那时日本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紧张、忙乱、贫穷，使父亲根本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这期间，他只发表了一些小说、戏剧、散文和时政文章，为的是获得稿费，补贴家用而已。

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谁知国民党热衷打内战，无心搞建设，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为了全家生计，不得不到处兼课，贴补家用。由于成天奔波于各大大学，更没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了。

(三)

解放后，父亲在大学任教，母亲也在大学工作，按道理说，此时生活安定了，环境改善了，家庭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了，再不为吃穿犯愁了。而父亲当时才三十七、八岁，精力充沛，正是搞学术研究的最佳年龄，本应该在教学、科研上大显身手。谁知道一场紧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向知识分子袭来，如思想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胡适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特别是 1957 年那场反右斗争，致使 55 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波高过一波的政治斗争，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特别是在教育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还被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致使他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怪现象，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谁就会被批为走白专道路。尤其是你不发表学术论文还无事，如果发表了，很可能就成了批判的靶子，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父亲 1962 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心理学的角度谈天资与勤奋的关系》的文章，“文革”期间就成了父亲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铁证”。

“文革”一开始，父亲（时任教育系副系主任）首先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多次遭到批斗、抄家。后来被赶到由所谓“牛鬼蛇神”组成的劳改队，天天要在胸前挂着

^① 《刘兆吉美育心理文艺心理研究文选·编者前言》，西南师大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黑牌子种树、挑大粪、除草、守厕所等等,还时常遭到“革命小将”肆意侮辱。最使父亲伤心的是,他省吃俭用、苦心积攒多年,装了满满七八个书架的书被全部抄走。而他心爱的心理学则被姚文元污蔑为“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反动科学,必须彻底砸烂”。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创建文艺美育心理学的希望之火却未熄灭,仍深埋在死灰底层”,^②因为他相信,严冬过去,春天就会来临。

(四)

1976年“四人帮”终于垮台了,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广大知识分子终于解脱了长期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父亲此时已65岁,但他精神振奋、信心满怀,立志在心理学,特别是在美育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中实现自己多年的宿愿。他说:

1976年“四人帮”垮台了,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被长期压抑的心理学界重新活跃了起来。1977年8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平谷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学科规划座谈会,全国只有23名代表参加,我有幸作为大西南的唯一代表参加了会议。嗣后中国心理学界连续举行了杭州、保定、天津会议,批判了“四人帮”对心理学的污蔑。同时受迫害的文学、美学、教育学也解除了禁锢,朱光潜等美学家的文章又在报刊上出现,我研究文艺美育心理学的思想又在灰烬中复燃。……即获自由了,大可奋笔直书了。^③

从1978年到2001年,即父亲从65岁到88岁的23年中,他在教学科研上奋发努力,创造了喜人的成绩。现将父亲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01年去世为止的学术成就分年叙述如下:

1978年(65岁),被提为正教授,是“文革”后西南师大第一批提正高职称的3名教授之一。这一年,四川省和重庆市心理学会也恢复活动,父亲被选为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和市心理学会理事长。他参加了由中国心理学会会长、著名心理学家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第15章《教师心理》的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79年(66岁),与人合作撰写了《对120名优秀

教师和模范班主任心理特点的初步分析》(载《心理学报》1980年第1期)此文被数十种书刊引用或全文转载。并撰写了《怎样才能学得好,记得牢》(《科学爱好者》1979年第1期)等2篇文章。

1980年(67岁),他参与撰写《儿童心理浅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发表《人民教师为什么要学心理学》(载《心理科学文摘》1980年第1期)、《评冯特研究心理学的道路》(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等7篇学术论文。

1981年(68岁),出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会议,在会上提议增加“美育心理”词条,撰写了“美育心理”和“教师心理”两个词条,标志着“美育心理”这一科学概念正式得到学术界认可。

1982(69岁),参与审定、编写《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并撰写了《〈乐记〉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心理学探新》1982年第3期)等9篇文章。

1983年(70岁),参与编写由潘菽主编《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并撰写了《试论文艺心理学的几个问题》(载《心理学科普园地》(1983年第3期)等10篇文章。

1984年(71岁),为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撰写教材《教育心理专题》,并撰写《王守仁的心理学思想》(《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等8篇文章。

1985年(72岁),撰写《〈文心雕龙〉中的文艺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报》1985年第2期)等8篇文章。

1986(73岁),被聘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七五”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心理组成员,并招收了中国第一届美育心理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3人(这些人如今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校的学术骨干),并撰写了《刘勰论文艺鉴赏的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报》1986年第3期)等12篇文章。

1987年(74岁),参与审定、编写由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并主编其中《文艺心理学》、《商业心理学》(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著《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西南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获四川省哲社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并撰写《创建美育心理学刍议》(《心理学探新》1987年第2期)等7篇文章。

^②刘兆吉:《我走过的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的研究历程》,载《刘兆吉美育心理文艺心理研究文选》,西南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③刘兆吉:《我走过的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的研究历程》,载《刘兆吉美育心理文艺心理研究文选》,西南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988年(75岁),参与编写《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并撰写《大学教师的威信及师生关系》(《西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8期)等7篇文章。

1989年(76岁),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从事科技工作五十年以上特授荣誉证书。撰写《美育心理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实践意义》(《上海高教研究》1989年第4期)等15篇诗文。

1990年(77岁),主编《美育心理学》(西南师大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9月再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美育心理学的研究专著,获四川省、重庆市哲社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和全国优秀教学图书展一等奖。撰写《从美育心理学的角度论文艺为人民服务问题》(《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等13篇诗文。

1991年(78岁),与人合作主编《高等学校心理学》(西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并撰写《教师的榜样与导向效应》(《西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等14篇诗文。

1992年(79岁),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主编《文艺心理学纲要》(西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并撰写6篇文章。

1993年(80岁),主编《美育心理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为全国哲社“七五”国家规划重点项目成果,获四川省哲社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又著《中学美育心理学12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并撰写6篇文章。

1994年(81岁),出席第二届中国教师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撰写《教师教育的美育导向问题》(《高校师资建设》1994年第2期)等6篇文章。

1995年(82岁),与人主编《高等学校教育心理学》(北京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此书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项目、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丛书。撰写《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青年谈治学之道》(《西南师大成人教育》1995年第2期)等8篇文章。

1996年(83岁),撰写《张伯苓的美育心理学思想》,载《刘兆吉美育心理文艺心理研究文选》(西南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等11篇诗文。

1997年(84岁),出席并在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项目“学校美育系统与美育心理发展

研究”全国开题会上发表讲话,撰写《潘菽先生其人及其在心理学方面的探新精神》(《心理学探新》1997年第3期)等10篇诗文。

1998年(85岁),出席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发言。撰写《与吴宓先生在一起——自学生到同事三十年回忆录》(载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等6篇文章。

1999年(86岁),为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和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部分硕士研究生讲授《文艺心理学》,并撰写《从美育心理学角度论文艺为素质教育服务问题》(《心理学探新》从刊1999年版)等18篇诗文。

2000年(87岁),撰写《七十年来文艺心理学与美育心理学创建与发展概况》(《西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等8篇文章。



2001年9月28日,刘兆吉出席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学校美育系统与美育心理发展实验研究”全国结题大会。这是刘兆吉生前出席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一个多月后就与世长辞了。图(中)为刘兆吉在这次大会上即席讲话。

2001年(88岁),收到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秘书处来函,大会执委会特聘父亲担任ICP2004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撰写《做党的儿子最光荣——一位八十八岁老共产党员的心声》(《西南师大报》2001年7月1日)等16篇诗文。9月28日,出席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学校美育系统与美育心理发展实验研究”全国结题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讲话,36天后,他在伏案写作时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他为心理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五)

在教学上,父亲不顾年迈体弱,勇于承担授课任务。在粉碎“四人帮”之初,高校虽然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但当时教心理学的教师十分紧张,父亲除了承担本系的心理学教学任务外,还主动承担了中文系等几个系的公共课心理学教学任务。身为系主任、教授,而承担外系公共课,至今仍是罕见的。当时一个教室无法容纳这么多学生,他就以电化教学方式上课。学生交来的读书报告一大摞一大摞堆在书桌上,他都一本一本仔细批改。年近七十岁时,还亲自带教育系学生到合川教学实习,甚至病倒了还坚持不肯回来。

2000 年,他已是 87 岁高龄了,当校新诗研究所和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希望他为两所部分研究生上《文艺心理学》课时,他毫不犹豫慨然答应。不能到教室上课,他就在自家窄小的客厅上课。当时两所领导想到他年龄这么大,上课不必太拘泥,课间可以多休息一下。谁知父亲讲起来滔滔不绝,不但不准时课间休息,而且有时从上午八点讲到十二点,学生不得不提醒他下课时间早到了,他才恍然大悟。但他上的课确实受到研究生的欢迎。新诗所有位研究生在 2006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深情回忆起父亲讲课的情景和他自己听课后的欣喜心情。他写道:

教育系的刘兆吉老师在吕老师^①的恳请下,以八十岁的高龄^②给我们开设了文艺心理学课程。上课前吕老师向我们打过招呼,说刘老师年纪大,身体弱,大家不要指望老先生在课堂上讲多少,但他肯定会讲一些西南联大的掌故,这是你们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事实正是如此。刘老师推崇美育,他认同儒家诗教,反复强调“诗,发乎情,止乎礼”,在课堂上讲了很多关于穆旦^③的逸事,关于闻一多的掌故,关于《西南采风录》成书的艰辛,这些东西我都认真做了笔记。……上刘老师的课很开心,开心得课间休息的时候真想在他家门口的泥地上打个滚。^④

我想,父亲如果知道学生们这么喜欢听他的课,

当含笑于九泉了。

(六)

胡锦涛总书记在《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 年第 1 期)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热情充分激发起来,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

事实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使父亲多年被压抑的事业心、爱国情犹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但他想到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中国心理学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的这种心情,在他 1999 年底,即新世纪到来的前夕写的一篇题为《跨世纪老人的心灵话》的文章中表达得最贴切:

回忆在旧社会爱国有罪,救国无门,工作生活无保障,悲观失望,陷入绝境。而今国家已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的综合国力,已使列强刮目相看了。深感自豪,幸为中国人。虽然退休了,不能在讲台授课了,但仍可在家里指导学员或在书桌上笔耕,发挥余热。在旧社会“度日如年”,今日却有“度年如日”之感了。几年前曾写过一首小诗:“老而不死烛未尽,退而不休吐余丝。老牛不计夕阳短,夕阳未必逊晨曦。”^⑤

写此文章时,父亲已是 86 岁的老人,但他那种不服老,还想在余生有所作为的心态跃然纸上。父亲去世后,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挂在遗像两侧的挽联概括了他的一生:

道德学问惠泽杏坛弟子允公允能桃李满天下
卓识远见创建美育心理可圈可点文章垂千古

是改革开放,驱动了精神文明建设蓬勃发展,才使广大知识分子有了“海阔任鱼跃,长空任鸟飞”的条件,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父亲在学术上的辉煌。父亲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责任编辑:韦俊)

^①吕进:新诗所所长。

^②实际上 87 岁。

^③穆旦:著名诗人,刘兆吉西南联大同学,“南湖诗社”社员。

^④姚家育:《墨水和油水——中国新诗研究所学习生活的琐忆》,《中外诗歌研究》2006 年第 3、4 期合刊。

^⑤刘兆吉:《跨世纪老人的心灵话》,载《刘兆吉诗文选》,西南师大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9 页。

校 档 中 的 侯 光 炯

编者按：为了再现土壤巨子侯光炯的人生历程及科研求索之路，本期《档案拾遗》栏目从校史档案资料中候老日记、考察报告以及候老的家人、朋友、学生等与他的往来书信遴选部分登载，以飨读者。



少年侯光炯

《少年》

地主杀我父，贫病夺我母。
少年命逆乖，彷徨苦无路。
父亲有遗嘱，哥嫂听吩咐。
毁家培弱弟，入学当书蠹。
十三进农中，三年即辍读。
替当练习生，每月七元五。
赖以济生计，家贫需照顾。
哀求入大学，免费靠分数。
又遇学潮来，衷心欲破碎。
负笈上北京，售稿把日度。
苦学二十年，困难业中过。

1910—1928年

吕巷——南通——北京

①

少年

地主杀我父	贫病夺我母
少年命逆乖	彷徨苦无路
父亲有遗嘱	哥嫂听吩咐
毁家培弱弟	入学当书蠹
十三进农中	三年即辍读
替当练习生	每月七元五
赖以济生计	家贫需照顾
哀求入大学	免费靠分数
又遇学潮来	衷心欲破碎
负笈上北京	售稿把日度
苦学二十年	困难业中过

1910—1928

吕巷—南通—北京

侯光炯青年时代所作诗词《少年》原文

侯光炯 1910 年就读吕巷镇第三小学，1917 年就读南通甲种农校，1924 年就读北平大学。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晴

米國加利福尼亞

地點 Westwoo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今晨由 Riverside 勤身 + 時五十五分始抵 Westwood 晴
Cameron 先生生年十九歲後長果林貽威亦博
彼先導余考察某林園以述果林管理及研
究研究工作主為譯文並摘述要點如下

1. 果林除 Walnut, avocado, 等深根作物外二萬
英呎以上土壤少於氣候及肥料之關係較多。
2. 排灌及施肥其管理不可離。
3. 此間氣候四季溫暖故風速緩一夏寒期之果
林又密桃梨蘋果之屬在冬季時常遭霜害
叶尚名之曰 frost bite up. 有一櫻樹子葉為中國溫
帶所無此子葉又遇強力寒風始能免受長
治寒之侵受其侵襲者則前令室中或山地
種移走以保產量。

1936年12月23日侯光炯赴美考察日记

1936-1937年，侯光炯赴美考察研究，主要对美国 California 一带土壤构造进行了考察，并撰写了大量的考察研究报告。

救世靈仙快
怨人傷自身
困難畜志氣
用腦保健康
苦干告絕技
夜之朝思
實踐出真知
朝夕記心懷

于他长宁免耕所的室内。
侯光炯自创健康歌，挂

李伟时、邹时

来信收到。对于您的来信，非常感谢，已经阅读。此次想请您到贵处学习。工作中，建议您多做些
探讨，是一些地主经济工作，原因很多，主要是

听说新闻中指出的很多问题，能否请您对土地制度与地
主私有、地主占有情况的一点。于此建议你到贵处进行
调查，为学生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土地制度一词，可以阅读《土地法》“三权分立”。

由于该地山地多，一般又都位于山地，所以不能这样。

已知工作，（如地主占有情况）等，都应了解
从于接触田地工作，土地公有制是土地公有制，土地私有制

有一本“十年来中国地主阶级”的油印件，是关于
内部制度，地主占有情况。此书说明地主占有情况
地主占有情况。此书说明地主占有情况。此书说明地主占有情况。
此书说明地主占有情况。此书说明地主占有情况。

此书说明地主占有情况。

候光炯
1961年8月25日

1965年，侯光炯写信给学生余杰进行
学术讨论。

目前西南大学档案馆已收录侯光炯写
给学生余杰的书信13封。

爸爸：存念

你對土讓這樣的忠心
研究將來一定是一個
有名的土讓學家
但是為我們候氏
是為我們中國造福

女兒宛清書於

四川北碚

有份答，那樣的

龍馬精神

四月

朱宝镛
十四日

侯光炯《辛巳旅赣纪念册》收录的女儿宛清的赠言。著名教育
家、科学家、酿酒专家朱宝镛在其后附题词。

1940—1941年，侯光炯被借调到江西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
他将亲朋、学生赠予的题词皆收录于《辛巳旅赣纪念册》中。

资料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

反右派运动中“右派”言论及“整风”史料选登

编者按：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全面成就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国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6月，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学术领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随着反右派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校也成为反右派的主战场之一。本期《档案拾遗》对校档中相关“右派”言论和“整风”史料进行选登，供读者参考与反思。从这些史料中，反映出我校教师心系教学改革、心系人才培养的拳热情感。他们当时发表的意见或提倡的改革等，有许多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以下摘录的文字片段，选自1957年8月中共西南农学院委员会宣传部选印的《西南农学院右派言论选辑第一、二集合编》中，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蒋书楠、刘佩瑛教授关于教育教学改革的“右派”言论。

农学院培养生产干部是教条主义

——蒋书楠^①答《海涛报》记者问

问：农学院培养的目标是什么？

答：根据高教部的意图，农学院培养的对象是生产岗位的生产干部，我个人认为高教部把农学院培养生产干部，综合大学是培养科研人才和师资，这是硬搬苏联的经验，是教条主义。因为目前我国的合作社，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合作社并不需要这样多的高级干部，而目前科研机关和教学单位，需要大批的干部，所以综合大学不能满足，因此必须由农学院分配一部份去。如果

按现在的培养方法，则不能适应此种工作。因此准备建立改变目前这种培养目标。培养出既能担任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又能担任农业生产的干部。但是，所学课程必须加深和增添。

问：同学们提出精减课程和减少考试科目，行政上准备如何决定？

答：高教部最近发出指示，不受过去教学大纲的限制，可以根据各学校具体情况掌握。我院正在研究同学

^①蒋书楠：曾任原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务长。

们提出的精简课程和减少考试科目问题，不久就能回答。我个人主张今后多以平时考查来评定学生的成绩，不要单纯以期终考试来决定。

问：关于毕业生分配问题？

答：过去有些不合理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干部层层下分，学校只能有权分到省，而省以下的分配问题，学校就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学校的分配主要由学生科掌

握，教师们很少能提意见，加之分配时也未注明该生适合某种工作。今后为了对毕业同学和对国家全面负责，建议以后由系提出意见，然后征求老师们和有关教研组及同学本身的意见，经教务处研究后提出该同学具体适合于科研教学或生产岗位的具体工作，在党按（档案）上注明，再由用人单位和人事部门具体分配工作。但总的精神是个人服从国家计划。

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只相当于解放前专科学校的水平

——蒋书楠在植保系“因材施教”论坛上的发言

培养目标是个根本问题，此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就不能解决，也是目前问题最多的原因。现在我们培养出的人才，只能相当于解放前的专科学校学生，不能相

当于高等学校的学生；只能适于生产岗位上之用，不能适于科研、教学之用。今后应该培养教学、研究、生产都能适用的人才！

改变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蒋书楠答《海涛报》记者问

现存的考试制度是很不合理的。这种考试方式，一方面逼得同学们硬背教条，因为背掉了一条就不能得到“优良”。特别是过去口试，每一个小问题都要背得烂熟才行。试问我们学的东西都需要，而且能够全部把它们背下来吗？事实上考完了就忘了一大半；另一方面这种考试方法也不可能考查出学生的真实成绩。往往平时学习好的人，由于考试一时疏忽背掉了一条，则得不到“优良”。而平时学习不好的人，考试时突击一下，或抽题碰巧得到了“优良”成绩。并且考试科目又多（至少四样，多则五六样），对身体不太好的同学来说，的确是负担过

重，影响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呼吁：此种教条式的考试必须改变，建议有条件的课程，多采用课程论文代替考试。因为通过写课程论文，不但促使同学们能更深入、更广泛地掌握这门知识，而且由于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就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因此老师可通过它考查出学生掌握这门知识的深入广度，正确评定一个学习不深入的人的真实成绩来。对于一些无条件写论文的基础课，应加强平时考试（考查），不要单纯以期终考试来决定成绩，应和平时成绩平均计算，避免产生片面性的错误。

培养目标必须改变

——刘佩瑛^①在园艺系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果蔬专业学生，读了四年到合作社去工作是不恰当的，但去作科学的研究工作基础又太差，所以我的意见是搞两个培养目标：一个是读三年，少学基础理论课，毕业

后参加实际生产工作；一个是读五年，读三年的基础课，毕业后专门到科学的研究机关工作。

^①刘佩瑛：曾任原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园艺系副系主任，蔬菜研究室主任，魔芋研究中心主任。

下文摘录的内容，选自《西师^①1958年教学改革有关文件》中，当时图画系教职员对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和看法。

西师图画系教学改革所揭发出的问题及今后改进意见

一、教学改革所揭发出的问题

(一)严重脱离政治：课程内容普遍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社会主义政治，缺乏思想性，把同学引向为艺术而艺术，形式主义或消极颓废的道路，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表现在教学目的上是单纯传授技术知识：如国画课的教学目的仅是“培养学生熟悉我国绘画的传统技法，使达到掌握并研究这些技法，以便运用到实际中去，”至于如何教同学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如何贯穿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育则根本不谈。欣赏课应有强烈的思想性，而教师的讲义中连教学目的也没有；导致学生学了一学期，连好画、坏画都分辨不清。

(2)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课堂讲授或辅导中，一般只谈比例、结构、线条、明暗、色彩，如何用笔墨等，关于思想内容很少或根本不管。

(3)重艺术标准，轻政治标准：在介绍作品和评阅学生作业时，教师只看技巧好不好，不考虑作品的思想性如何，导致有些作品充满资产阶级情调而不自知。

(4)重技术，轻理论：从系上开设的理论课看(包括美术史、教学法)，仅占技术课的12%。全系29个教师中，专门教理论的仅二人(一个是右派)，去年修订的教学计划，竟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这门灵魂课取消了。教师的进修也是纯技术锻炼，艺术理论知识相当差，更不用说政治理论水平了。有的教师连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搞不清楚。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二)教学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是脱离实际：中心是轻普及重提高，脱离师范性，脱离工作群众。如反映在

教学上，教师是培养画家而不是教师，什么都与美专比，不结合中学实际；反映在创造思想上，则追求“高级的画”，对群众喜闻乐见的画瞧不起；在教学态度上，反映出的重创作，轻教学，对教学不负责任的现象也很严重。

二、今后改进意见

(一)加强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课，特别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一课要及早培养教师。另外在低年级的美术常识中，应专门用一学期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学生首先明确文艺方向。

(二)加强教学内容的思想性

(1)每个课程的教学目的应明确，特别是技术课，要使学生了解掌握技术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学这门课；

(2)在课程内容上，应尽量选择有意义的，能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题材来画，反对形式主义；

(3)在教学中应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教育。

(责任编辑：洪秋冰)



^① 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

编者按：吴明珠，女，生于1930年1月，湖北省武汉市人，著名瓜类育种专家。1953年毕业于原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园艺系，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后，她几番请求，终于来到新疆这块神秘的土地，扎根于当时最贫苦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县。至今，她为新疆的瓜果事业已默默耕耘了五十几个春秋，新疆90%以上的瓜类良种都是她和她领导的团队培育出来的，经省级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推广种植面积占新疆商品瓜区的80%。

海

明

珠

载

——追寻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的载育瓜路

□文/王慧敏



吴明珠深入瓜田，细心观察

有人称她“西部瓜王”，有人称她“哈密瓜之母”，还有人称她是“中国当代甜瓜大王”……

这些称谓，如果向她求证，她都会谦虚地予以否定。但新疆的瓜农们不会否定，大快朵颐的食客们不会否定，中国园艺栽培史也不会否定。中国工程院院士简介中对她如下评价：

吴明珠，新疆甜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主持选育经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30个，推广种植面积占新疆商品瓜区的80%，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数十亿元……

理想——“人生最美好的是，你创造出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几经约定，终于“逮住”了吴明珠。77岁的年纪了，她还一年到头不停地奔波——要么在海南进行哈密瓜南移试验，要么在吐鲁番的试验田里为新品系授粉。和她面对面，是在吐鲁番“新疆哈密瓜研究中心”蒸笼般的瓜棚里。火辣辣的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额头上的汗珠不用擦拭，马上就蒸发殆尽。

谈起往昔的一切，老人语气淡定：“这一生，也没做什么大事！只是一直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老人一生有着什么样的理想呢？

1930年，吴明珠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任黄兴的秘书。其后，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到武汉兴办教育，希冀教育救国。她的父亲、叔叔也都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她，从小就立下了报国之志。上初中时她曾在作文中写道：“长大要为人类作贡献。”父亲问她：“你靠什么为人类作贡献？要作贡献，首先，要学有所长；其二，要脚踏实地做事。”父亲的教诲影响了她一生。上大学后，她的人生目标更加明确。21岁生日那天，她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心得：“人生最美好的是，你创造出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1953年，吴明珠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园艺系果蔬专业毕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填报毕业志愿时，她积极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然而，作为组织重点培养对象的她，被选送到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向中央要干部。经过几番软磨硬缠，吴明珠终于从北京来到了新疆。到新疆后，又是一番软磨硬缠，她落脚到了条件艰苦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县。

吐鲁番是新疆著名的瓜果之乡。种瓜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然而，物竞天择。任何一个植物品种，如果不进行提纯复壮，不进行改良选育，最终都会退化，甚至灭绝。摸清家底，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吴明珠用3年时间，走遍了全地区300多个生产队，一块瓜



吴明珠在瓜地指导工作人员

地一块瓜地调查，将全地区的甜瓜资源分类整理成44个品种。从此，吐鲁番的甜瓜有了自己的基本档案。现在红心脆、老头瓜到处都能见到，就与那次普查分不开。红心脆是在迪坎乡发现的。“记得那是1960年夏天，为了找到这个品种，我和同事李志超在戈壁里走了两天。收了种子，正准备回去，又意外发现一个新品种——巴吾登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老头瓜。这种瓜又软又香，我们高兴坏了，抱着瓜往回走。中午戈壁滩的地表温度高得吓人，我们走得又渴又累，李志超还是抱着瓜不撒手。我突然想到了，真傻！其实瓜是可以吃的，只要把种子留下来就行了。于是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把瓜吃了，味道好极了。我笑着说：‘这个瓜能送给毛主席吃就太好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人开怀大笑。

民间栽培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是推动品种改良的好方法。但是，对已经习惯了传统种植模式的瓜农来说，乍然用新方法，一时难以接受。怎么办？吴明珠决定：示范开路。在当地有名的瓜把式摩沙大爹帮助下，吴明珠在东湖的沼泽地边开了3亩生荒地，做为她的示范园。不远处，就是摩沙大爹的瓜田。她与摩沙大爹打起了“擂台”。摩沙大爹用传统方法栽培他的瓜苗，而她用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管理她的瓜田。吴明珠成了摩沙大爹家的成员，每当夕阳西下时，摩沙大爹会站在田头像呼唤亲生女儿一样唤她回去吃饭。尽管饭食只是硬硬的高粱馕饼，但她吃起来是那样的香。比尼亚孜

汗妈妈怕旷野的狂风吹乱她的长发，下地前都会照维吾尔族的习俗用树胶梳理她的发辫。两位老人还给他们的汉族女儿取了个维吾尔族名字阿依木汗，意思是“月亮”。秋天来了，她的瓜地被人踩出了一条小径。人流是摩沙大爹引来的。老人不厌其烦地向参观的人们夸赞她的女儿如何神通，种出的瓜如何好吃，以及科学种田如何“亚克西(好)”。人们开始相信这个还是一身学生装束的女技术员了。

“园艺工作者是塑造新生命的艺术家。”这是吴明珠

常说的一句话。52年来，吴明珠把育瓜水平推向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境界，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育种创新体系。从农产品的收集整理，提纯复壮到常规育种；多亲复合杂交育种的杂优利用；辐射育种、生物育种、转基因育种及航天育种，她总是站在科技的前沿。一个品种的育成，一般要经历8至10代。有的人穷其一生只能搞出一个品种，而她，实现了三年五代。这在育种史上是不多见的。

习惯——“习惯是培养出来的。只要习惯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从1955年进疆到现在，吴明珠在新疆已生活了52年。当年那个梳着一条粗黑辫子的俊俏姑娘，如今已鬓发斑白。家乡的桑麻，家乡的水。从南国水乡来到瀚海大漠，吴明珠经受了多少生活的考验！然而，问起这些，她回答得很平淡：“习惯是培养出来的。只要习惯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说起“习惯过程”，老人不时朗声大笑，似乎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的身上。来新疆前，从没吃过羊肉，初到鄯善农民家住，淳朴的老乡端上香喷喷的手抓羊肉，她吃了一口就跑到门外去吐了。不过，倔强的她擦干眼泪，装着没事，回来接着吃。“现在，我觉得新疆的羊肉比什么都好吃。”当时住在农民家，睡在毡子铺的热坑上，农民照顾她，一定要让她睡在最热的坑头。可越热虱子越多，一身痒痒的，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后来，虱子再多，倒头就能呼呼大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我算是体会

了。”都说武汉是“火炉”，但和“火洲”吐鲁番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1958年夏季，她到吐鲁番吐峪沟蹲点，这里位于火焰山口的峡谷地带，即使到了晚上，气温仍不低于40℃。当时，她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夜夜在床上“翻煎饼”！不过，慢慢地，也就适应了。她还有了个“小发明”：当时还不通电，照明靠蜡烛。由于温度高，蜡烛也弯了腰。她试着把碗扣在一盆水里，在碗底上放蜡烛，蜡烛直了。

“刚开始向农民学维吾尔语时，还闹了不少笑话呢！”一天晚上睡在瓜棚里，小伙子们问她几点钟了。她说9时。因发音不准，把“钟”的发音“泰艾”说成“艾尔”，小伙子们惊呼：“什么？你有9个男人？”众人大笑。现在，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连鄯善、吐鲁番的土话也说得很地道。了解吴明珠的人都说，她的心态很好。

执著——“瓜，才是她的孩子”

吴明珠心态好，基于她的“在乎”与“不在乎”。在吴明珠的心中，除了瓜，她把个人的一切，看得都很淡。她的女儿曾对别人抱怨：“我们不是她的孩子，瓜，才是她的孩子。”她的两个孩子都是由父母、哥嫂带大。孩子们小时候管舅舅、舅妈叫爸爸、妈妈。

1983年，好不容易盼来了“文革”后的首次评职称。最有资格申报的她，却没有报送申请材料。别人问她为什么，她淡然说，正赶上给瓜授粉，不能为了职称而误了

农时。

1984年，一条新闻引起轰动：育种专家吴明珠辞去吐鲁番行署副专员职务。这条新闻在当地没有太大反响——因为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对她来说，这样做不奇怪。1978年，上级部门任命她担任副专员时，她就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她有5/6的时间搞科研；二是保证她的试验基地不变。在任期间，她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瓜田里，人称“瓜专员”。

吴明珠深入实验区实地考察



为了瓜，她有时候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1984年，一位领导来鄯善视察，研究所请这位同志品尝甜瓜新品种时，吴明珠要求大家一定把瓜子留下。也许是看到客人对这些漂亮的金色网纹的甜瓜爱不释手，视察结束时，研究所一位好客的同志即兴送给来宾一个甜瓜。吴明珠得知这件事后，派车去追，并对送瓜的同志说：“你非给我找回来不可。”

瓜是追回来了，但有人说：“不就一个瓜嘛！也只有她做得出来。”“老人家的眼贼着呢。几亩大的瓜棚，少一个瓜她都能知道。”她的助手冯炯鑫告诉记者。新品种栽培，从选种、播种、打埂、铺地膜、授粉到鉴定品样、测甜度，她都亲历亲为。一直到现在，每天她还坚持下田。

她把育种当作了生命！人们这样评价。

追求——“一个人的追求，只有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一致时，才会有动力”

在吐鲁番采访，记者听到了很多有关吴明珠的“神话”：有人说，她种瓜成精了！一块地，只要她打眼一看，就知道种什么品种的瓜合适，保证产出来的瓜又大又甜。还有人说，瓜生病了，你只要在电话里把情况跟她说上几句，她就能马上开出“妙方”，比神仙还灵。吐鲁番的瓜农有这样一个共识：只要按照吴老师教的方法去做，个个能发财。大家把她视为“女财神”。所以，吴明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瓜农热烈的欢迎。

当然，国内外那些种瓜的农场主、大老板们，也都把目光投向吴明珠。开出的价码，让许多人惊羡不已。但是，吴明珠全谢绝了。她向记者坦诚：“如果我育瓜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早成百万富翁了。只为个人而奋斗，不会走得太远。一个人的追求，只有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一致时，才会有动力。”她说，她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人民支持的结果。那一件件往事，她铭记终生：1957年春天，她和村里的维吾尔族瓜农到距县城30多公里的沙山下搞育种试验。一天下午，她沿沙山检查瓜情，县委通讯员骑着马来，叫她去县里开会，她来不及告诉大家就进城了。第二天中午她回来了，一进瓜棚，小伙子们都欢叫着跳起舞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们说：“你昨晚没回来，大伙儿急坏了，点着火把找了半夜，怕你被狼吃了。正要到县里去报告哩！”她激动得边跳舞，边流泪。“有如此真诚朴实的农民兄弟，你能不为他们终身服务吗？”她说。

1972年春天，她到吐鲁番红旗公社蹲点。因“文革”耽搁，甜瓜育种中断了好几年。她心里着急，便把手头保留的所有试验种子都种了下去。当瓜苗长到4—5片

真叶时，一天中午突然刮起了狂风，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大队回族支书沙伦来了：“这风不会长，你安心呆着！”说完就走了。风越刮越猛。常言道：“天一黑一亮，大风三丈”。看来10多年的心血全完了。吴明珠欲哭无泪。黄昏时，大队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撞开了，滚进来一个人，满身满脸是土，仔细一看，原来是农民试验小组的组长。他说“沙伦支书叫你放心睡觉，20亩的瓜苗子，全部用湿沙埋好了。”吴明珠急忙问：“沙伦书记呢？”农民回答：“他坐在瓜沟里累得回不来了。”

“五十多年来，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每次都增加了我和当地干群的感情。为他们献出所有的一切，我都无怨无悔。”吴明珠说。

资料摘选：王慧敏.瀚海明珠——追寻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52载育瓜路[N].新疆日报.2007-09-04

资料来源：<http://61.128.100.120/News/markd/195252.shtml>（文章略有改动）



吴明珠伏案研究，执着追求

（责任编辑：刘广生）

晏阳初与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文/晏鸿国^①

编者按：晏阳初(1890—1990年)，四川巴中人，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1943年，他与爱因斯坦等被美国一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他一生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1926年，他以河北定县为试验区，开启了而后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河。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1940年，晏阳初于四川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为乡村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他一面组建农民抗战教育团，一面继续开展“县单位”与“省单位”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1950年以后，他将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事业推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以“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为口号，指导推行田间实验与社区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晏阳初在重庆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乡建院”)，学院坐落在距北碚10多公里的歇马场附近的大磨滩旁，没有雄伟的大门，没有高大的围墙，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几排白色的平房，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与周围碧绿的田野和农舍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图，真是一所独特的高等学府。

乡建院的独特不仅表现在她优美的自然环境，更表现在晏阳初先生的办学思想、办学模式等方面。当时晏先生担任最高国防参政会参政员，受命负责川湘两省的后方建设。他认为后方的建设主要是乡村的建设，而乡



晏阳初

村建设是一个包括人的教育在内的系统工程，要进行这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本着为中国的乡村建设，特别是战后农村的复兴培养人才的目的，他费尽心机创办了这所学校。为了达到这个特殊的目的，他要求学生“应当达到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因此，学院在课程的设置上，不完全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标准进行，而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自行安排。学院的教学活动也严格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附近的璧山县就是学院的实验基地。社会系的学

^①作者为晏阳初侄孙、晏阳初纪念馆馆长。



1940年建在北碚歇马场大磨滩附近的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旧址

生深入附近农村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业和水利系则针对人民的需要展开乡村建设工作,教育系到农村办扫盲班和平民夜校。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大磨滩水电站就是当年水利系的师生自己设计的。1949年江津发生严重的广柑果实蝇虫害,平教会从璧山、合川抽调了20余名农业技术人员和学院的120余名学生,组成了“江津甜橙果实蝇防治队”,分赴江津各地,开展扑灭虫害的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因此,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都较强,许多学生毕业后直接参加了晏阳初领导的华西实验区的工作。

乡建院提倡学术自由。不同流派的学术思想,都可以在学院讲授,让学生们进行比较、分析、鉴别,通过独立思考以决定取舍。学院专门聘请了梁嘉(又名马特,中共党员)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有徐坚教授讲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王慰民讲授《中国通史》。马寅初、费孝通、老舍及其夫人都曾受聘为学院的客座教授。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学生们不但可以看到美国版本的书籍,还可以看到各种进步书籍如《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等,甚至还有中共“七大”文件。学生们可以自己办墙报,组织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开讲演会,研究会等等。晏阳初还把学院的学生会改为“四自会”,四自就是自治、自习、自给、自强。自治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自习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力;自给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生产力;自强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健康力。四自会的干部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他们在协助学院和为学生服务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才干,在学生中有着很高的威信。有

些四自会干部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者后来被发展为党员,所以,在学生运动中,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通过四自会得到贯彻和执行。

乡建院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当时各个大学按教育部的规定都要设立政训处,晏阳初为了保持这块“民主自由园地”,坚决抵制在学院设立政训处。他也不允许在学院成立党派组织,但实际上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一直存在,并积极活动。此外还有“六一社”、“新青社”、“民青社”、“野草社”等进步社团组织。因此乡建院的进步势力大,进步活动受到的阻挠少,学生们将学院称之为“沙漠绿洲”、“民主堡垒”、“小解放区”。乡建院的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在重庆历次的学生运动中,他们总是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是重庆学生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乡建院的师生也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主要目标之一,在1947年6月1日的大逮捕中,乡建院就有31名师生被捕,占全院师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后经地下党组织和学院的全力营救,放出了29人,其余两人后来牺牲在中美合作所,至重庆解放为止,学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旧址(今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内)
院共有5名烈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乡建院成立于1940年10月,开始只有农村教育和农业两个专修科和一个研究生部,故只能叫做乡村建设育才院。1942年又增加了水利和社会两科。到1945年才更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4个专修科改为系并获准该院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1952年乡建院改名为川东教育学院。不久全国院系调整,该院师生分别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和南充师范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胡小京)

西南大学寻根（之二）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

□文/洪秋冰



编者按：在上期的“西南大学寻根”之旅中，我们游览了川东师范学堂，了解了其建校历程和学科设置。本期，我们将继续寻根之旅——探访当时以“研究乡村建设学术，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实验乡村建设工作及推进乡村建设事业”为宗旨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

如果说川东师范学堂是西南大学的种子，那么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则可说是她破土而出的嫩芽。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建立，延展着西南大学这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

随着乡村教育实验的深入发展，鉴于四川乡村建设人才的匮乏，四川教育界及社会热心人士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成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川东师范学堂作为川东所属三十六县师资教育的基地，在1932年就设立了乡村师范专修科，并奉二十一军军部命令于1933年春正式成立了中心农事试验场，初步具备了创办乡村高等教育的条件。因此，川东师范学堂校董会代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上书政府，请求将乡村师范专修科和中心农事试验场合并组成四川乡村建设学院。1933年7月，政府同意创办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并颁发了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大纲。同年8月，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磁器口正式成立，随即开始招收本科学生，“而以乡村师范专修科为本院专修科，中心农场试验场为本院农场。”学院位于磁

器口之南，距重庆四十里，俯临嘉陵江，有车船往来重庆，交通颇为方便。环院有凤凰、歌乐等山，“冈峦起伏，遥抱两侧”，“中贯小溪……细流潺潺”，“景色秀丽”、“颇富乡村自然之美”。

学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综理院务。下设教导、行政和农事等三部^[1]，各设主任一人，商承院长分别处理本院各部的有关事宜。设院务会议，为本院最高议事机关，由院长、副院长、各部场主任、各系主任等人组织^[2]，办理院长及院务会议交办事项，并负责拟定各部预算及章程，筹划并督促各部科工作之推进，首任办公厅主任张俶知实际主持院务。此外还设有各种委员会，以推动各有关事项之开展。甘绩镛为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是刘湘二十一军的政务处长，同时又是重庆大学的副校长。他的最大优点是“热爱教育、热爱学生”，虽然他并不常住学校，但他所延聘的一批专家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他主持了内部活动：张宗麟先生担任教导主任兼乡村社会系主任，陈让卿任农事部主任、中心农事试验场副场

长兼农事系主任，张俶知任办公厅主任兼乡村师范专修科主任，生物教师陈邦杰负责总务工作。因为甘绩镛在校时间很少，所以实际上由办公厅主任张俶知代行院长职权，主持校政，每周到政务处向甘绩镛作一次汇报和请示。学院的办学方向及校风受张宗麟先生的影响较大，但张宗麟先生在学院任教的时间不长，故甘绩镛又聘请邵鹤亭先生来院任副院长，兼教农村社会学课。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建立的宗旨，在于“研究乡村建设学术，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实验乡村建设工作及推进乡村建设事业”^[3]。因此学院成立后，全院教职工即奉此旨，发挥苦干实干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教学、研究实验以及农事试验和农事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教学方面，学院的教务部根据本院设立的宗旨，“不仅注意于学生知识之培养，并注意于学生技能之实习，以及体格与军事之训练，品行与信仰之陶冶。以期学生能深入乡村，领导乡村建设运动，从事乡村建设工作”^[4]。为此特提出如下的教学方针^[5]：

- 1、培养乡村建设之热忱与信仰；
- 2、培养乡村建设之学识与技能；
- 3、培养负责与创造之精神；
- 4、培养健康与耐劳之体格。

教务部除规定了明确的教学方针外，还针对当时社会弊端拟定了颇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训育目标，即：身体劳动化、精神集体化、工作合理化。

在学科设置方面，各系的课程是紧密围绕培养乡村建设人才这个总方针设置的，体现出了教学、生产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精神。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颇具特色：一般课程都比较重视联系实际，教师们常以调查研究所得来丰富、充实教学内容。有的还摆脱了先生讲课，学生听的呆板方式，采取多种办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课堂生动活泼。如张宗麟老师教农村经济学课，除在课堂进行系统讲授外，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学院附近的农村，分户调查地租和地租外的其他各种剥削形式。这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既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使学生深受教益，增强了改造农村，改造社会的责任感，真是一举多得。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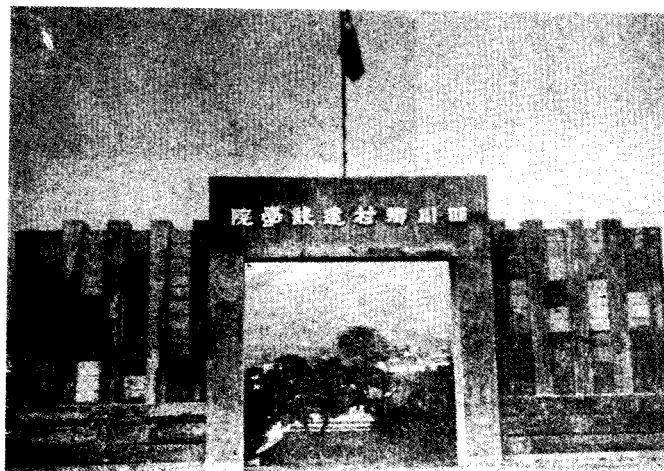
得。

学院的另一个特点是“搞学术的气氛相当浓厚”^[6]。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建设的宗旨与普通大学不同，“除训练乡村建设人才外，并须从事乡村建设之研究与实验工作，以为推进乡村建设之准备”。学院的组织大纲第五条就规定：“本院为研究实验乡村建设工作起见，得设各种乡村工作研究室及各种实验事业机关，并得呈请政府设立乡村建设实验县区”。早在学院筹建时就积极购置各种研究实验设备和器材，建院之初就着手开展有关活动。邵鹤亭担任副院长后就更重视，因而设立了乡村社会研究室、乡村教育研究室、乡村经济研究室、地方自治研究室以及自然历史研究室五个研究机构，还设立了复元乡村教育实验区和磁器口社会改进会等实验机关，并设研究实验部以总其成，且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学院的另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就是农事试验场，即第二十一军戍区中心农事试验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本院设农事试验场作农事方面之研究与试验并供全院学生实习之用。”^[7]农场在管理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首先是有明确的目的和途径。建立该场的目的是“研究四川农业问题，改良四川农业方法”，以“谋民食民衣之解决”^[8]。具体途径是：改良农用动植物品种；研究农用动植物之栽培及光临方法；推广科学的农业方法；调查四川的农业情况^[9]等。为此，采取了有效的策略：一面与省外、国外成绩卓著的农业机关合作，利用其改良之成绩而推广之，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如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

作棉作地方(纯系)实验、小麦地方试验等;另一面是,对省内的“良法优种”进行深入调查,搜集整理和研究试验,“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加以“发扬光大”^[10],以便巩固和“发展四川固有农业之精粹”^[11];再者是重视人才,“用人惟才,不仅有学历,且需有经验;并注意其与国内先进农业机关之关系,以期公私两方皆可联络合作,事半功倍。”^[12]农场也讲究效率,强调实干、快干。正是这种种原因,试验场在经费不多,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建院之初,学校规模较小,仅设有乡村社会系和农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校门

事系两系,加上从川东师范学堂合并过来的乡村师范专修科,学生总数也只有百余(两个系不到八十人^[13]),专修科学生后来只有二十一人,经过批准,承认其学籍,1934年毕业),教师和职工的人数则更少。截至1935年初为止,全院共有教师23人,除了一个军事教官外,专业课教师共22人。其中教授(包括兼任)11人,讲师10人。别看初建的学院规模小,但她却有一个上述较好的领导班子,有一批热爱教育事业的职工,尤其是有一些学有专长、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和著名教育家。如当时学院延聘的教师虽然都较年轻(最大的38岁,最小的26岁),但专业方面的根底都较深,讲师一般都是大学本科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且有在高等学校或其他单位工作的实践经验。教授们不但对专业研究有素,教学经验也比较丰富,其中大多数都曾赴法国、日本等国留学。如副院长邵鹤亭,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等校校长、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等职。此外还有勤奋好学、肯为乡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学生,因此学院以其优良的校风、学风及其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促进乡村建设事业发展可贵贡献,受到时人的赞誉,进而四川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注释:

- [1] 后改为总务、教务、研究实验三部及农事试验场。
- [2] 见《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厅会议规程》第二条。
- [3]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大纲第二条。
- [4] 见《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一览》第24页《教务概况》。
- [5] 见《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一览》第24页《教务概况》。
- [6] 凌文远:《在川教院重庆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 [7]《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一览》第4页。
- [8]《四次乡村建立学院一览》第43页,《四川农业》第3卷1期第71页。
- [9]《两年来之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第3页;《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一览》第45页。
- [10]《四川中心农事实验场》“弁言二”,载《四川农业》第2卷5、6期合刊第1页;《两年来之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第3页。
- [11]《两年来之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第3页。
- [12]《四川中心农事实验场》“弁言二”,载《四川农业》第2卷5、6期合刊第1页;《两年来之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第3页。
- [13] 张鉴虞《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史回忆录》。

(责任编辑:胡小京)

编者按：张永青，1916年5月出生，原名张积玉，山西榆次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五台、崞县、定襄县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第八地委宣传部部长、书记，晋绥第八军分区政委，中共吕梁区委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川北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副部长。1954年后，任原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党委书记兼院长，1983年任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1990年离休，1999年去世。



张永青

笑貌言行历历在 点滴总关情

□文/ 张小真^①

出版《永青文札》，为的是把爸爸留下来的一些文字资料以文集方式保留下来，为党史、给后代留下一点真实的宝贵资料。由于“文革”期间爸爸把许多重要的笔记和文件、文稿交给了“工作组”，而“工作组”在离开西师时为避免因留有“黑材料”带来的麻烦，把爸爸交给他们保管的一箱文字材料全部销毁，因此爸爸留在家中的正式发表的文字东西不多，《永青文札》中收入的仅是我们在整理爸爸的遗物时陆续找出来的、分散放在家中的部分文章、稿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他离休以后根据中共山西省党史办公室及过去工作过的晋绥地区党史研究室等有关方面的要求陆续撰写的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只有少数几篇是在离休前工作时期写的。因此，这本文集不是专门的回忆文集，而是把爸爸生前写的一些文章、稿件的汇集，本不打算由他人写回忆文章。

随着《永青文札》出版工作的进行，根据编辑的建

议，为了反映亲友对爸爸的思念之情，才收入了少量爸爸去世不久即收到的老战友写好的回忆文章及几封来函，并决定再由我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是家中长女，又是与爸爸一起生活最长的子女，受他关爱和教育最多，写回忆爸爸的文字应当是责无旁贷。

然而，写回忆文章并非易事，一方面，爸爸生前从未向我们完整的讲过他的经历；另一方面，在协助母亲整理出版《永青文札》的过程中，记忆的长河又打开了，思绪联翩，彻夜难眠，千言万语不知从何下笔。

爸爸和母亲李兰相识于晋西南，1940年结婚。我爸爸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1945年出生于晋绥八分区交城关头，是个马背上长大的孩子，加之我的生日是马克思诞辰日，所以父母给我取名为“小马”（张小真），而由此一来，我的弟妹们分别都有小名“小牛”（张小勇）、“小羊”（张小阳）和“小猫”

^①张小真，系张永青长女，曾任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7月病逝。

(张小枫)。在姊弟四人中,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尽管是战争年代出生,但我很幸运,除了1947年短暂的离开外,我的童年基本上生活在爸爸身边(大弟小勇被送到农民家寄养,1949年才接回),1949年母亲去接大弟小勇时,爸爸还独自带了我一段时间,在我患重病发高烧时,是爸爸给我输的血。1964年高中毕业我到北京上大学离开家,在外学习工作到1980年12月。由于为了照顾父母从山西调回北碚工作的小阳(时任北碚区团区委书记)于1980年3月不幸因公殉职,我接过小阳照顾父母的担子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

因小勇和小枫在外地工作并先后出国,所以我长期生活在爸爸身边,一直到他因脑血栓于1999年4月12日住院,1999年4月27日因病抢救无效去世。

爸爸从没有给我们系统的讲过他的家庭和历史,我们只是从他零星讲述的“在山洞里与豹子对峙”、“裹着棉被滚下山坡突围”等战斗故事中知道一点皮毛。对于爸爸的基本历史,我还是在1967年“文革”中因贴了对“四人帮”江青不满的大字报被批斗而限制离校时,从同学带给我的西师来的小报中得知他是1935年由李雪峰同志介绍入党的红军时期的老干部……透过《永青文札》收入的文章所记述反映的爸爸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在各个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各个工作岗位上的战斗、工作的主要经历,我才算对爸爸的个人历史和为人有了完整的了解。爸爸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岁月有值,人生无愧。爸爸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在晋绥大地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南下后到川北、西南局(重庆)以及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工作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进行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从事党务、行政工作,还是从事文化教育战线的领导管理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英勇奋斗、努力工作在革命的第一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勤奋努力,贡献了毕生精力。

在我们的印象中,爸爸在家中的主要时间都是坐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不是批文件、写材料,就是看书、读报,

和家人的接触主要是在饭桌和饭后,偶尔一起散散步。有了电视以后,看新闻联播也是全家聚会的时间。爸爸既严肃,又慈祥,性情温和,难得见他发脾气。他平时话语不多,如果不太忙,有时也和我们讲个故事、开个玩笑,甚至跟着录音机或电视机唱一下山西梆子和京剧。爸爸办事向来认真踏实、一丝不苟,对待工作、生活都是如此,例如尽管他长期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但由于他按医生嘱咐坚持吃药,认真配合治疗,还是以八十三岁的高龄辞世。爸爸生活俭朴,对穿衣、吃饭的要求

不高,家中的家具简单,只要还能用的东西,他绝不让更换,他在西师家里用的办公桌一直是那张从到校后就用的大黑桌子,就是在1994年搬到西师四新村29舍后,因房间太小桌子太大影响他行动,我们想给他换一张,他也不答应。爸爸因工作忙,没有太多时间与我们共享天伦之乐,也无暇顾及我们的学习及生活。虽然爸爸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奉献出了生命最宝贵的时光,但他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仍给我们的成长与教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记得在川北时,我和大弟小勇被送进了幼儿园住“读”,在西南局,不仅我和小勇被送进人民小学住读,小弟小阳也被送进了幼儿园住“读”。当时有继祖母在家中,完全可以照顾我们,但爸爸为了锻炼我们的生活能力和集体观念,坚持要我们住读。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按学校规定,我有独立回家“资格”,可以不用家长来接,家里就约定继祖母只接小勇,而不接我。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到西南局家中时,发现家里没人,门被锁着,我围着屋子转了好几圈,就是进不去,急的我只想哭。但我转念一想:问问胡亦仁伯伯家也许就知道了,他和爸爸都是宣传部的。我找到王阿姨(胡亦仁伯伯的夫人)家一问,才得知我家搬家了,可新家我没去过,怎么办?王阿姨让我在他家等人来接,但我想起和家里“不用家长接”的约定,决定自己找回家去,最后根据王阿姨的描述找到了西南局小礼堂后面的新家。半路上,天下起了雨,我到家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挂在书包上的布鞋还丢了一只,大人们看到我这个落汤鸡都笑了,问我为什么不在胡亦仁伯伯家中等他们去接,我回答



《永青文札》封面

说：我有资格独立回家，要遵守约定不用人接。爸爸听后很高兴，表扬我有志气，克服困难遵守了约定。在西南局撤消后，爸爸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全家从上清寺搬到北碚，但我和小勇仍然还在城里住校，离家有100多里，每个月在父母进城开会或其他同志进城时才被顺便接回家住一个晚上，而平时的周末都是到两路口市总工会姨妈那里玩半天就算了。直至1956年我因患流行性感冒病危住院，家里才放弃了让我们继续住校的方案，转学回到父母身边就读。小时候的住校生活对我的锻炼及影响至今难忘。

爸爸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是多方面的，他不仅要求我们在学校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劳动与活动，而且要求我们在家中都要“劳动”，包括自己屋的清洁、拔院子里的草、给屋外的树和花浇水、种向日葵，以及到厨房做一些家务事、到街上的煤站挑生活用煤等。隔一段时间，爸爸还会到我们的房间检查清洁卫生。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家的粗粮不在粮店买，而是由每家自己到农村生产队直接去挑回来，虽然我们家请有保姆，但我们家的大部分红薯都是由我和大弟小牛走十几里路到山上挑的，那时我才13岁，而小勇也才11岁。爸爸的严格要求也延续到了我的孩子身上，我的两个孩子在小学阶段就参加了不少家庭劳动。当时家长们都在想方设法帮助孩子抓学习或增长艺体方面的多种才能，我有时也说没必要让孩子做那些家务活，但爸爸总是对我强调不能让孩子们“读死书”、“死读书”，要全面发展，锻炼生活能力。正因为此，在我丈夫去四川外语学院进修和出国访问的两年多里，孩子们确实帮了我的大忙，而他们自己也增长了一定的生活能力，为以后到北京上大学独立生活奠定了基础。

爸爸很反对特权思想，要求我们不要以干部子弟自居，要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衣着都很朴素，和普通人家的孩子穿的没有两样，而且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的穿了小的穿。刚从人民小学转到西师附小时，小勇因为穿的旧衣服是人民小学统一做的花衣服，还被同学们笑话了几天，直到小勇因被笑话而不愿上学才给他做了两身新衣服。爸爸不许我们说他担任的职务，我和弟弟的家长会都是继祖母参加，连家长签名也是继祖母，直至我在西师附小毕业时，一些科任老师都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爸爸参加革命几十年，认识的老领导、老朋友很多，但他很少给我们提起。尽管在

北京，甚至在中国科技大学就有爸爸多位老战友，但我上大学到北京的第一学期简直就是举目无亲，一到周末，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直到第二学期开学，他到北京开会见到康世恩和李琪，老战友们批评他不带我去他们家时，才带我去认识了这两位伯伯的家，我才有了个去处。但就这样，他也叮嘱我不能常去，不要影响大人的工作，不要给别人“吹”，要好好当自己的学生。1980年底我回到西师后，爸爸与我的第一次谈话中就宣布了几件事：不要想当干部，不要想出国，自己的工作自己负责，老老实实当好教师。我在西师工作的20多年中，担任过十多年没有干部级别的基层党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仅在1994年才担任了以教师身份兼职的系党总支书记。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是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外语有基础，也很想有机会到国外进修提高，但我还是按照爸爸的要求坚持在岗学习，放弃了多次的出国机会。

爸爸从一名中学生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转战多个领导岗位，靠的就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勤奋学习和自立自强、顽强拼搏。爸爸的许多讲话和文章都是自己起草，只要他自己能做的，就不会麻烦别人。特别是在他去世前住院离开家时，尽管因脑血栓手臂已经抬不起来，但仍然坚持要自己刷牙、梳头，收拾床铺、桌子。爸爸经常教育我们：能自己做的一定不求人，能努力办到的一定不放弃。我小学六年级要去农村参加一个星期的劳动，学校要求自带行李，看着被子、褥子、枕头、换洗衣服和洗脸盆这一大堆东西，怎样才能把它们捆在一起？我一筹莫展，突然想到了爸爸的警卫员，想请他帮我捆好行李，在我走到爸爸警卫员住房的门前时，正好碰见爸爸，因爸爸不允许我们找他的秘书和警卫员帮我们做事，我吓得扭头就走。爸爸叫住我问有什么事，我只好如实禀告，他听了以后说，我教你，自己会了以后就不难了。在爸爸的指挥和帮助下，我终于把要带的东西捆在一起，就像军人的背包那样方正。自此以后，走到哪里，捆背包对我来说不但不再是难事，而且成了我的一门技术。在爸爸的熏陶下，我们都有一股拼闯劲和知难而进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爸爸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他为我们做出了学习的表率。他不仅终身坚持学习政治理论，而且长期坚持学习教育管理科学知识，甚至还专门学习英语和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直至晚年依然刻苦学习，勤于思考，笔耕不

辍。爸爸对新事物、新技术、新知识都很有兴趣，在他去世的1999年的年初，还坚持读《光明日报》有关计算机用于教育的文章，不仅把资料剪下来送给我，甚至和我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如使用计算机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成本、效果等。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外出不论到哪里，总带有一个小包，里面放着他当前的学习材料、笔记本和一个小收音机，就在他去世前往医院时，也没有停止过学习，虽然因脑血栓手脚活动不便，但他的包里仍带上了全国人代会的有关学习材料，并要我们从家里搬一台电视机到病房，以便看新闻和更多的了解国家大事。爸爸常说他只是一个中学生，是靠着学习才能跟上形势工作到现在。他在大建安村小学教书时，也才是初中程度，教高小的国文并不容易，而且还不懂教学方法，通过虚心学习和钻研，他不仅胜任了教学工作，还得到学生好评。爸爸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而且非常重视从实践中学习和向人民群众学习，正是通过勤奋学习，他从外行转变成内行，在各个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在对敌斗争中学习，他出色的完成了多个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在战争中学习，他担任主要领导的八分区多次受到晋绥分局表扬；在建设中学习，他在川北负责宣传工作时，多次受到西南局的表扬；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学习，他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工作和高校干部培训工作多次受到教育部的表扬；……他甚至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学习，成了我们家的半个医生……受爸爸的影响，我们家中人人都爱学习，虽然父母从未对我们的学习做过任何具体指导，但我们姊弟四人在学校的学习应当说都还可以，平时我们自觉地上自己的学，每个学期把成绩册交给父母看，放假时就读许多自己喜欢看的书，这些书来自父母的书架和图书馆。我们收到的生日礼物多数都是书籍和学习用品。尽管爸爸不过问我们平日的学习，但他只要有时间，就会经常“考”我们，他不是问功课会不会，而是问看了哪些书，读了哪些文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学校有哪些活动，等等，他注重的是我们是否自觉地学习，是否有收获，知识面是否有扩大。爸爸对学习习惯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我的子女，我的两个孩子能有今天的成绩，与他们小时候的良好学习习惯是分不开的。

爸爸始终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文革”以后，他有许多机会到北京等地条件较好的单位和地方工作，但他看到百废待兴的西师发展的需要，得知数百名西师教工挽留他的报告，他放弃了个人

的发展机会，留下来全力以赴的改造西师从梁平迁回北碚时的困难局面，任劳任怨、勤奋努力的忘我工作，为西南师范大学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爸爸常教育我们，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不能一事当前我字当头。他不止一次的给我们讲述战争中他亲眼目睹的战友牺牲的故事，他常说：那么多革命先烈前仆后继为共产主义和人民利益牺牲了自己，我们能活到今天已经不错了，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的呢？1980年3月小阳因公殉职后，我匆忙赶回家中，本想安慰年迈的双亲，但一想起风华正茂的手足兄弟小阳，一想起“文革”中小阳忍辱负重照顾父母的诸多往事，我实在不能自拔，一连几天痛苦不已，反倒是父母对我进行劝解：小阳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我们活着的人还要继续为人民工作，不能一天只顾自己的哀痛。爸爸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不仅在忍受着老年丧失爱子的巨恸中坚持工作，而且要我提前返回工作岗位。就在爸爸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尽管他已自感身体状况不好，而且在多种仪器的监控下，但他得知我还要准备西师现代远程教育一期工程的招标书时，仍然对我说：你回去忙你的去吧，学校的事要紧，他坚持让我离开医院回西师。想不到这一别后，爸爸竟在第二天就默默地离开了我们，使我抱憾终生。

爸爸坚持党性，不因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在晋绥工作的后期，因当时个别领导的工作错误，他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爸爸也从来没有为保自己而乱揭发这位领导同志，他依旧遵守组织原则，不该讲的就是不讲；而为了搞清事实，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在《对晋绥工作的几点认识——晋绥革命根据地史料征编座谈会书面发言材料》中，他仍对有关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呈述。爸爸顾全大局，重视团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待“文革”中犯过错误的一些干部，他坚持根据干部的才干予以任用，而没考虑他们在“文革”中对自己的态度。

爸爸的组织观念很强，很注意遵守组织纪律原则和保密规定，他在家中的办公室长期以来与卧室合一，从不许我们动他办公桌上的东西，哪怕是《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等报纸。小时候，如果我们要进他的房间，在门外就先报告他，而屋里如果有人在谈事，就一定不许我们进去。他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后，这个习惯仍然坚持下来，就是我调回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后，只要他屋

有外人，我和孩子都不会进去。对于我和弟妹们的升学、就业、评职称，爸爸从不伸手帮忙，我和小勇参加高考那两年，他严格执行回避制度，都没有担任招生委员会主任，我们两人都是凭自己的考试成绩被录取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而小阳在当知青时提干和小枫上大学，也都是凭自己的表现得到领导与群众认可而争取到的。“文革”后期，劫后余生被“解放”的干部们之间逐渐恢复了联系，因爸爸到北京看病，我请假从宁夏（当时我被分配到宁夏吴中广播器材厂）陪他，按照他的要求联系上胡耀邦、张稼夫、饶兴等老干部，这才认识了更多的老前辈。1973年，我初次到张稼夫伯伯（曾任国务院文教办主任等职）家时，听他们“表哥”（张稼夫同志），“表嫂”（张稼夫同志夫人王亦侠同志），“表弟”（我爸爸）地叫起来是那样的亲切，实在不解，一问，才知道张稼夫伯伯与爸爸在山西工委机关工作时，曾以表兄弟关系掩护共产党员身份，就像《红灯记》里的那样。当前辈们谈起过去的战斗经历时，他们是那样的兴奋、热情，我坐在他们身边旁听受到很大教育，而在前辈们谈到当前国事时，爸爸总不忘了叫我找这些家的子女们去聊，不要我坐在他身边再听下去。我和丈夫李建国调回西南师范学院工作时，爸爸一再叮嘱我们：你们要靠自己当好一名教师。回西师这么多年来，尽管他从1983年底就离开了西师的领导岗位，但他一直遵守回避规定，不论是升职称，还是担任干部，从未就我们两人的事找过学校。在我担任系总支书记时，他从不给我讲他看到的内部文件，也从不过问我的具体工作。只是在1998年冬，为了抓住学校新的发展机遇，邱玉辉校长和我谈话，希望我承担起西南师范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创办工作，我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决定接收这一任务后，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爸爸时，爸爸才和我较长时间地谈了一下。他问我两点：这次工作变化是学校的意见还是我个人的要求？做出这一决定是考虑自己的发展还是学校的发展？在我回答了自己的想法后，他告诫我：做决定一定要有正确的出发点，不能因担任系总支书记影响专业发展而考虑个人得失借机推掉党务工作；干部要能上能下，这次工作变化意味着我将由一个处级干部转变为一名普通的教研人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当好普通一兵。

爸爸很注意联系群众，与他来往的不仅有领导，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般干部和工人。我上小学时，对到我家来玩的同学，只要告诉家长的名字，爸爸都能说出他

们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甚至是哪里的人。在我回西师工作后，我或孩子陪爸爸散步时，他对遇见的认识的人总要打招呼，问寒问暖、问健康、问生活，因此每次散步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根本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反而消耗了不少时间，以致外孙们都不愿再陪他散步。爸爸对人和蔼可亲，不论是他工作单位的干部、教师、学生，还是原来的秘书、司机、警卫员，只要不违反原则，他都尽力给予帮助。甚至在他不担任西师的领导后，仍然要我或外孙陪着去看望西师的老教师，而每次看望人，那些老师的家在何处，在几楼哪个门，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有的同志去世后，他因行动不便不能去看望，还专门要我代他向家属致哀并参加告别会。在我担任系总支书记工作时，爸爸多次提醒我走群众路线的事，要求我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和党的政策，切实地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就是在他去世前住院我去看望他时，他还对我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当时我正在负责西师现代远程教育的筹备工作，要准备工程招标的标书，要争取经费，要落实西师现代远程教育中心工作人员，要搭建西师的网络教育支撑平台和开发一批教育资源，还要向教育部写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申请报告，……压力很大。爸爸见我情绪不好，尽管他是那样的虚弱，还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要多发动人干，走群众路线。当时，因学校医院人员紧张，不能按正部级待遇为他抽出专门的保健医生，时任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王长楷教授、邱玉辉教授决定在学校机关中轮流抽一名干部在医院值班负责与学校、医院联系和管理照顾他的护理。爸爸以学校领导对他住院护理的这一安排作为走群众路线的例子又对我进行了一次教育。

回忆爸爸的漫长人生，他的笑貌言行依然历历在目，他的点点滴滴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然而这一切绝非三言两语可以描述，又岂是我的拙笔能够刻画？《永青文札》出版在即，不容我再思、再想、再写，而且爸爸革命的一生也不是由我能评价的。今年5月22日是爸爸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在这里，我仅从子女的角度反映他的一个侧面，并以此文献上一份女儿的祭奠和思念。

爸爸已去世7年了，他的离去使我们悲痛，但他的教诲又给我们以力量。缅怀爸爸，可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是：我们和子女们没有辜负他的教育和期望。遵照爸爸的教导，我和丈夫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都成为教学科研工作骨干，我不仅完成了学校交给的现代

建国 60 年西南大学毕业生就业纵览

□文/刘沐璠

编者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毕业生最为关切的话题。随着人事制度的改革和人才供求关系的变化,大学生就业模式从“国家包分配”到“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逐步转变。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大学生的就业政策体系,推出引导毕业生创业和面向基层就业的鼓励政策。在新的就业形势及政策下,大学生的自主择业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和创业意识等明显增强。本期《蒹葭之声》从我校编印的千余份校报中精选出建国 60 年以来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整理,透视毕业生择业观和就业方式的发展变化。



2006 年西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一角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设事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对高校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的原则。广大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无条件地服从祖国分配。下文选自 1958 年 5 月 24 日《西南农学院》^①第三版,反映了高校毕业生自愿投身到祖国艰苦地方去工作的坚定决心。

远程教育的创办工作,而且在专业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名博士生导师;我的两个孩子中,女儿李颖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儿子李毅,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工作;我的弟妹们也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才能,他们的子女也正在努力求学,为今后的发展刻苦钻研。我们之所以能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进步,都是和父母的教育分不开的,是他们的优秀品格和高尚人格激

励、鼓舞着我们不断前进。

思念无尽,亲情难舍,总有一别。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强大,我爸爸和无数的革命先辈们为此奋斗了一生,现在他们都走了,但他们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奋斗一生、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愿青山绿水伴他们永远安息!

2006 年 2 月 8 日于重庆北碚
(选自张永青《永青文札》,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责任编辑:郝龙)

^①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原西南农学院校报。

我院应届毕业生向 全国各高等农林院校应届毕业生挑战应战 ——提高政治觉悟 服从统一分配(节选)

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洪流中，我院应届同学怎能按得住即将走向生活，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激流的喜悦和兴奋！特别在反右斗争后，自双反、交心运动开展以来，同学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懂得了一个人应有的生活目的，愿意为共产主义忠诚工作一世。为了能互相帮助、共同前进，我院应届毕业生同学写信给全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同学发起友谊的挑战、应战。他们提出的条件是：

.....

二、坚决无条件服从祖国统一分配，决不挑肥选瘦，愉快的走向工作岗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逐步改革经济体制，全面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家对高校毕业生仍实行包分配的制度，号召毕业生到人才紧缺的基层就业，提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下文选自1981年11月21日《西南师范学院》^①第三版，反映了高校毕业生选择到基层、边疆扎根成长的志愿。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节选)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物理系七七级全体毕业同学敲锣打鼓来到办公大楼前，庄严地向院党委表示决心：坚决服从党的挑选，立志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说，面临毕业分配，是服从党的挑选，争取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是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个同学面前的一份毕业答卷。我们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粉碎“四人帮”、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入学深造的机会。祖国的困难，我们必须分担，个人利益必须无条

方去。

三、在工作岗位上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决不贪图享受和计较生活待遇，比艰苦、比干劲、比又红又专和红透专深。

.....

在这封充满革命友谊的挑战、应战书中，我院应届毕业生同学恳切地表示：“要共同携起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里，乘着跃进的东风破浪前进”！

目前我院应届毕业生，正以冲天的干劲，按照他们提出的挑战、应战条件，战斗在学习和生产实习等岗位上。



莘莘学子专心听课，为奔赴祖国基层作准备

^①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原西南师范学院校报。

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改变边疆和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我门肩上。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是,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相比,我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

他们说,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青年学生坚决服从党的挑选,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党指向

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立志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把我们美好的青春和所学的知识奉献给人民。拿出我们的毕生精力,为党的教育事业,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

.....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逐步改革对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的就业模式。1989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以下两篇文章分别选自1997年12月10日和1998年4月25日《西南师大报》^①第三版,反映了在新的就业形势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毕业生认清形势、及早备战的情况。

厚积薄发,从容就业(节选)

12月6日,我校18个院系28个专业的1000多名98届本专科学生怀着兴奋而又有些紧张的心情云集校学生活动中心,接受来自江苏、云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46家单位的挑选。因僧多粥少,场内外略闻一股“硝烟”味。

全面发展、一专多能的学生受到青睐,党员和德才兼备的干部尤为抢手。云阳中学负责人坦言:“我们需要的不是高精尖专业研究人才,而是知识面广,能适应形势快速胜任的通博人才。”

历史系94级本科的小杨就凭着四年来的全

面素质,闯开了“本科生免谈”的宜宾教育学院大门。“我们只需要语文、数学方面的硕士以上学历且安心教育工作的师范毕业生。”面对领导的“苛刻要求”,小杨从容不迫:“老师,我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写作功底,曾多次被评为省、市、校级先进,现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100余篇……”他一面说一面拿出一大叠证书和个人作品集。对方对眼前这个个头偏矮的小伙子开始产生浓厚兴趣,最后不但降低学历标准特殊录用,还让其享受优厚待遇。

.....

欲得霜刃利 四年勤磨砺(节选)

西师教科院的刘同学在去年11月底就与重庆一所高校顺利签约,成为班上也是院里最早与用人单位签约的毕业生。

“功夫在门外”。刘同学说,“如果说应聘使我两天内取得成功的话,实际上我为这次应聘准备了整整四

年的时间,从我踏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志愿,决不荒废时光,一定要让这四年过得充实而有价值。在这四年里,我勤奋读书、写作,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没有跟着感觉走,而是让理智之光为我引路”。

^①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原西南师范大学校报。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节选)

一份设计新颖、朴实大方、真实可靠的自荐书等于是自己的脸面,往往能起到令考官眼睛一亮的作用。自荐书不仅要包括自己在这四年中所取得的成绩、获得的荣誉等,还要突出自身的特长和特点,尽可能地将一个全面的、多元的自己展现在用人单位面前;面试时的语气、气质、风度更是表现自己学识、修养、素质的关键因素。除了平日的积累,还必须经过精心充分的准备,“临时抱佛脚”总比不抱要好。中文系的李同学在面试

前就根据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自己设计了几十道题目,结果,面试时,除了极少数的题目外,大部分题目都是他早已准备好的,他胸有成竹,回答自然流畅、准确、条理分明,得到面试教师的认可,小李最终与这家单位顺利签约。另外,应聘时服饰、妆容也是不可忽视的。得体大方的服饰、清爽明丽的面容能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而在应聘过程中,主考官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非常重要的。

1999年,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数量大幅度持续上升,我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此时国家进一步加强引导,鼓励毕业生创业,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2007年3月10日《西南大学报》第三版登载了荣获“2006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的邓家兄弟放下身段、不等不靠、勇于自主创业的事迹。



邓家兄弟荣获“2006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

邓费建、邓波兄弟谈大学生创业(节选)

日前,我校荣昌校区动物医学专业和动物科学专业学生邓费建、邓波兄弟俩,因自强不息、勤工俭学、自办养猪场还贷读书的动人事迹(我报曾以《两个“养猪”的坚强青年》为题报道,见第22期第3版)而成功当选“2006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近日又被评为“2006感动重庆十大年度人物”20名候选人之一。

记者:在开办养猪场之前,你们考虑到风险了吗?

邓费建: 风险和效益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起初,身边的人都表示反对,但是我并不打算就此放弃,于是我就和弟弟一起,跑遍了荣昌县所有的养殖场,进行市场调查。根据调查我们发现,由于暑期大旱,许多养殖场都把猪宰卖了,那么在9月底的时候,猪价肯定会上升并增高,我想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对此,我们当时就信心百倍。

记者：创业需要投入。在创业之初，你们是如何筹钱的？

邓波：这是一个胆量问题。如果确定要做这件事情，就要敢做敢为。我们是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通过借钱和银行贷款凑齐了启动资金。我想，如果在亲戚不愿意借，在银行贷款因没有抵押无法贷到款的情况下，也可以找一些有钱的人融资，但要说服他，让他相信你，相信你能帮他赚钱，他才能给你投资，这当然就需要很大的魄力了。

记者：你们读了大学，反而到农村养猪去了，会不会有人觉得不合适？

邓波：肯定会有很多人这样认为。我觉得没关系，主要是对自己人生愿望的把握，我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感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记者：对于未来，你们有什么规划？

邓费建：不久前，一个亲戚从新疆回来，他说那儿养鸡缺技术，把我们哥俩说动了。我们想毕业以后工作两年，攒点钱到那面发展。“支持西北”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另外，我觉得要填补中国的一些空白，比如中国猪肉出口的问题，我们肉质的安全达不到标准。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深一步去做。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不能愧对这个专业，我们想把眼光往外放，挣一些外汇。

记者：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你们觉得是创业好还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好？

邓费建：这主要看自身所处的位置如何，比如你的家庭条件和所处的氛围，如果适合创业的话，就可以去创业。但是如果暂时连自己的生活问题都保障不了，也没有投资基金，没有好的项目的话，最好先就业，到一个企业学习一下，也为自己积累资本。

记者：大学生要想创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邓费建：这是一个筹备的过程，在校期间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从现在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当时进校以后，所有的活动和一些锻炼机会我们都在把握，并主动争取这些机会。我在班上是班长，弟弟是他们班团支书。大学生说不上谁管谁，但组织活动对自己的磨炼很有益。

记者：大学生创业刚开始都是一些小字辈，该怎样判断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邓波：作为大学生来说，我们还年轻，也有干劲，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其他的则没有优势。所以必须要踏实勤奋。另外，还是把自己看低一点比较好，别以为大学生出来创业就很了不起，就比那些小学六年级出来创业的老板强，这不一定，我们要把自己看低一些。

记者：走创业路时，经常会遇到徘徊、动摇的时候，你们以自己的经历来看，该如何判断？如何选择下一步的行动呢？

邓费建：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把握信息，再进行综合分析，看这个事情到底成功的机率有多少。如果确实亏损的话，即使再坚持也没有用，不如放弃。即使失败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财富。

记者：重庆大旱的时候，别人都在抱怨，你们却觉得这是老天给的机会，这是不是说明创业观念也很重要？

邓波：我想，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很重要的。劳累和苦难其实是一种耕耘，它们孕育着收获。我们一开始办猪场的时候，大家对我们印象不是很好，后来人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就积极去帮助他们，接触几次他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在农村，都喜欢勤劳、懂事的孩子，如果一天闷头睡大觉，别人也不会喜欢，更别提帮助了。

记者：你们也是贫困生中走出来的，对于贫困生，



邓波、邓费建两兄弟大三时即开办养猪场，
挣钱为父治病和缴学费

创业是不是更难?

邓波:如果是有钱人做这个事情,可以抱着试试的态度,而贫困生要开辟一个项目,我觉得应该慎重考虑。但是现在一些贫困生觉得自己穷,没有资本投资,很自卑,宁愿去做服务员、推销员、家教等等,当然这些也是很好的工作,但是眼光不能太狭隘,如果有好的机会必须去抓住。比如突然接触到一个对你有影响的人,就要多找机会跟他学习,思维必须要开拓。

记者:现在就业难,但是当有一些下基层的机会摆

在面前时,很多大学生还是不愿意去,你们是如何看的?

邓费建:每个人的追求和观念不一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过去有人认为我们想法庸俗,现在又有人认为我们有了一点积累和名气了,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不必再吃那么多苦。我是在想,如果我在一个城市,挣10年的钱能买一栋100平米的房子,但是到西北,苦5年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近年来,由于金融海啸的影响,世界经济状况普遍较为低迷。为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同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下文选自2009年3月10日《西南大学报》第三版,反映了高校毕业生认清现实,重新定位,自愿选择到农村、下基层,做一名“大学生村官”。

到农村去 当一名“大学生村官”(节选)



重庆市启动“万名大学生村官计划”

“老知青”与“新知青”

4个月前,家住江北的我校硕士研究生郑艳通过考试选拔,前往渝北统景镇平安村当“村官”。

凑巧的是,郑艳的爸爸郑仁海于1975年下乡,是中国百万老知青之一。郑艳赴任村官那天,爸爸没有为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稳步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从去年到2012年,重庆市启动“万名大学生村官计划”。“计划”同时规定:大学生“村官”任职满两年后,经考核合格可直接录用为公务员。该政策得到我校学子的广泛关注。不少学生表示愿意到农村任职,当一名“大学生村官”。

儿送行,只笑着称女儿是新一代知青。“她们这次上山下乡,和我们那次不同。我所以不送她,是因为我对她放心。”郑爸爸认为,“当年,我们到广阔的农村去是行政行为,而她们现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

“下基层没有想象的艰苦”

邹虹是我校2008届民族学专业毕业生。去年,她作为基层选调生,来到了秀山县中和镇贵图村村委会当上了主任助理,成为了一名女村官。

邹虹说,毕业时既报考了公务员,又参加了大学生基层选调。而最后,她放弃了已经考上的公务员,选择了当村官。“我觉得当村官更能体现我所学专业的价值!”2008年9月,她开始了村官之路。走马上任后,邹虹除了在镇上做文秘工作,每周都有几天走进村里协调纠纷、宣传政策。

“下基层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艰苦!”邹虹称,她目前各方面都不错,村民们待她很热情。但由于当村官

才几个月,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也有不足。谈到下一步的打算,邹虹表示,她将增加自己下村的时间,系统化地教村干部使用电脑,更好地为广大村民服务。她认为,毕业生就业找准定位很关键。

复习备考 爭当“村官”

张林是我校应届大学毕业生。目前,他正在积极复习,准备参加今年的“村官”选拔考试。他说:“当‘村官’就等于到乡村基层锻炼自己,这也许更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乡村里有淳朴的乡土民情、安静祥和的生活环境和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这都是让我们向往的理由。”



国家号召毕业大学生“到农村,进基层”宣讲会

(责任编辑:田朋朋)

南京大学档案馆信息化建设

□文/王 娜

南京大学档案馆成立于 1986 年 4 月，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档案馆之一。1999 年 4 月，南京大学成立了校史博物馆，由档案馆负责筹建，并于 2002 年 5 月 20 日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正式建成开馆。南京大学档案馆位于学校老图书馆内，校史博物馆位于学校文科楼旁，两馆建筑面积 2700 平方米，使用面积 2000 平方米。档案馆给人古香古色的视觉享受，散发着独特、浓郁的文化气息。而现代计算机管理科技的运用，更是让南京大学档案馆在档案的信息化建设方面走在了高校档案馆同行的前列。

南京大学档案馆和校史博物馆为系处级建制，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馆长汤道銮，副馆长王振银。现有 17 名教职工，其中 90%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有 6 名高级职称人员。下设文书档案室、科技档案室、声像档案室、档案馆办公室、史料征集编研室、校史馆管理室、计算机网络室及《学校档案》杂志编辑部等科室。档案馆现有馆藏档案 7 万多卷，保存了自 1902 年建校以来的学籍档案、校史及校友档案，1949 年以来的党政管理档案，1978 年以来的教学、科研、人物、名人全宗、外事、基建、

设备、产品、财会、出版、声像等方面档案资料及奖状奖品实物档案等^①。

南京大学档案馆是全国档案界最早利用计算机管理档案信息的单位。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档案信息的需求，早在 1983 年就开始采用计算机管理科技管理档案信息，设计了“微机科技档案管理系统”，先后自行开发了 7 套档案管理软件，其中 2 套获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奖。档案馆现有计算机 50 多台，实现了部分馆藏多媒体档案数字化、档案信息管理数据库化和档案信息查询网络化。档案馆还先后建成了 20 多个机读档案全文和档案目录数据库，向计算机内录入 20 多万条档案信息，扫描照片 3 万多张，采集视频 200 多部。并用两台服务器，在校园网上建立了“南京大学档案馆”和“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网站，通过网站向全校和社会提供网上目录和全文信息查询及利用服务，进一步发挥档案信息资源服务学校和社会的作用。现已向社会发布 50 多万条档案信息，网站的访问量已达 330 余万人次。

档案馆还于 2001 年在校园网上开发了纯 B/S 结构的“南大之星”档案网络管理系统 6.0，可在互联网上进

^①<http://dawww.nju.edu.cn:8000/>

行电子文件全文自动著录、自动标引以及各种格式的档案全文、照片、录音、录像等多媒体档案的远程录入与文件图片的上载,信息检索打印、任意格式输出等。该软件采用B/S和C/S两种结构模式,既可用于档案馆及校内各单位档案员用户管理、联机管理档案数据库,又可让全校师生、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通过互联网远程操作,登录校友业绩信息,上载校友保存的史料及获得的各种奖状、奖品的扫描图像,或查询有关档案信息等。档案网络管理系统6.0是集档案全文管理与全文检索,图像、录像、录音等多媒体档案管理、档案信息统计、档案借阅利用等功能于一身的档案管理系统软件,它不仅可以管理文件级、案卷级、全宗级的档案,还可以进行收发文管理及多媒体档案管理,从而使档案管理工作向电子化方向发展。

2003年5月16日,学校制定了《南京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意见》,并决定从2003年起采取全校各单位形成的档案材料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同步归档措施,实现以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为核心,以电子信息管理为重点,确保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安全地保存在学校档案馆这一目标,要求档案馆及时将非保留的电子文件全文输入到档案信息管理数据库,并在校园网上向广大师生提供档案全文信息服务^②。现在,只要读者打开南京大学档案馆的网站,就可以在信息查询栏目中轻松查找到学籍、南京大学专利档案、科研成果、研究生论文、职称评

审、南大新闻全文、南大历届毕业合影等方面的信息。在数字化档案馆栏目可以使用教授业绩信息采集、校内网页信息采集、电子文件全文检索等服务。

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大学档案馆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有目的、有步骤地迈开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南京大学档案馆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摸清现状。南京大学现有系处级以上单位共70多个,每年都要形成教学、科研、党政管理、基建、会计、出版、声像、实物等方面的档案近万卷。为了管理好这些档案,除了学校建立档案馆以外,

全校各单位都配备了兼职档案员,各院系都设立了科技档案、教学档案分室。兼职档案员负责本单位形成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的收集、积累、鉴定、归档及电子档案的保管



南京大学档案馆和校史馆

等全过程的管理,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同时各个单位将形成的应归档的电子文件也交给本单位兼职档案员管理;将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全文,通过数字化校园上的文件管理系统上载到档案馆的服务器。目前仅档案馆馆藏的各类档案已达7万多卷(不包括各院系档案室保存的档案)。档案馆和各院系馆藏的档案、资料基本上都经过规范化整理,编制了案卷目录、卷内目录、专题索引等检索。档案馆先后自行开发了7套档案管理软件,管理档案目录、全文和多媒体档案信

^②<http://daww.nju.edu.cn/news/015.asp>

息,自行开发了档案全文自动著录系统,并将1992年以来校长办公室打印的所有电子文件全文全部归档。现已录入计算机的档案案卷目录和文件目录信息达40多万条,校长办公室打印的电子文件全文5000多份,扫描照片15000多张,采集学校重大活动视频200多项。档案馆录入数据库的信息已达馆藏档案的80%以上。1997年,档案馆在全国档案界率先开通了国际互联网上的档案网站,并通过校园网将20多万条非保密的档案信息挂上校园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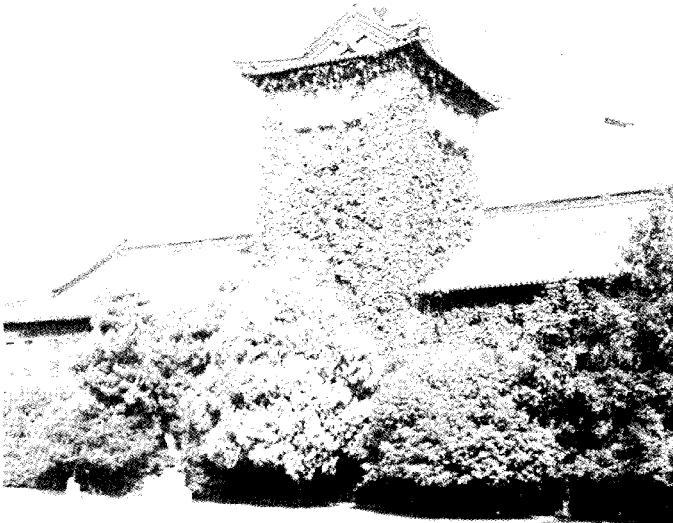
在此基础上,档案馆还尤其注重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建设。全校各单位、各院系档案室负责收集和保管本单位已经产生的应归档的电子文件,最大限度地降低已生成信息资源的流失率,并将电子文件的数据信息输入数据库,以便于提供检索利用服务。从2003年开始,采取电子文件归档与纸质档案归档并用的措施,即归档纸质文件时,须同时将同版本的电子文件归档。学校档案馆还提前做好了收集和接收电子文件的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人员培训工作。建立文档数据管理中心管理系统,创造条件接收全校各单位归档的电子文件,并在校园网中提供检索利用服务。档案馆还发挥文档管理的技术优势,以统一标准的格式存储电子文件,编制电子文件检索、分类索引数据库,保证政务系统中产生的电子文件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安全性和方便、快捷地提供利用,保证电子文件长期存储数据的安全、准确迁移,保证存储的电子文档信息的长期利用。

南京大学档案馆在加强基础设施与应用系统建设的同时,还注意与学校信息管理部门的密切配合,建立“电子文件(档案)数据管理中心”(简称文档数据中心)。中心设在学校档案馆,是学校信息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档数据中心集中管理校园网内各单位的归档电子文件,并在校园网上提供非保密电子文件查询、利用服务,实现电子文件信息资源共享。并在南京大学全校范围内大力推进电子文件全文归档工作,同

时加强馆藏纸质文件全文的数字化工作。档案馆还与教育技术中心密切配合,将全校重大活动中形成的新闻录像档案数字化并及时归档,建立数字化视频档案数据库,以便于全校各单位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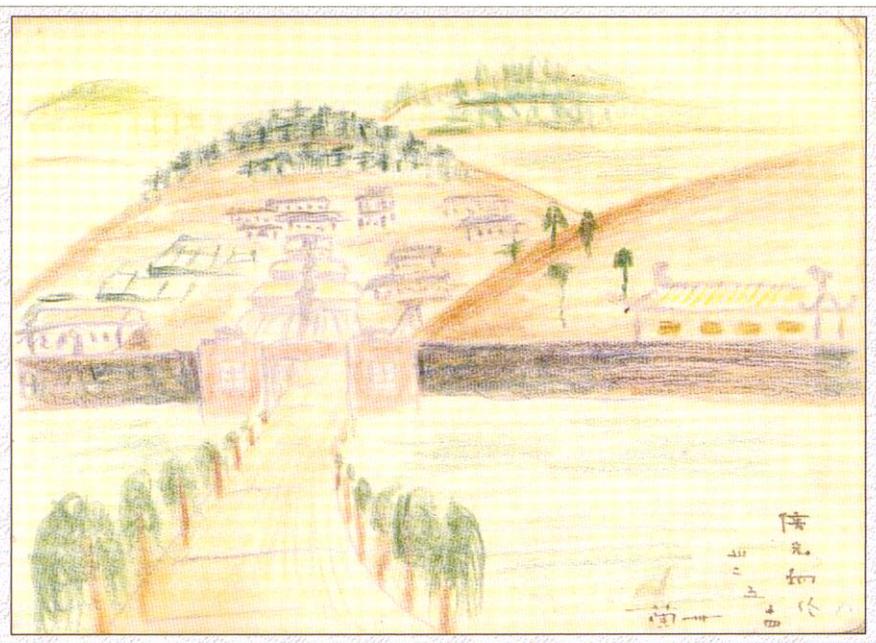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大学档案馆在学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及档案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全面负责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每年在布置、检查各单位、各院系的纸质档案归档时,同时布置、检查相应的电子文件归档工作。学校档案馆指定既懂档案业务又懂计算机管理技术的专业人员,具体负责各单位归档的电子文件的收集整理、统计、备份、数据库维护和信息咨询服务工作。还将各单位归档的纸质文件及电子文件目录信息在网上公布,以便大家及时了解本单位形成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归档情况,及时督促尚未归档的情况,保证归档齐全。这就为南京大学档案信息化的落实提供了及时有力的保障与监督。

高校档案是高校重要的本源性信息源,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是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高校党务、政务信息的存储、管理和提供利用的职能。通过学习、借鉴南京大学档案馆信息化发展的经验,有利于加快我校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从而为全校师生以及社会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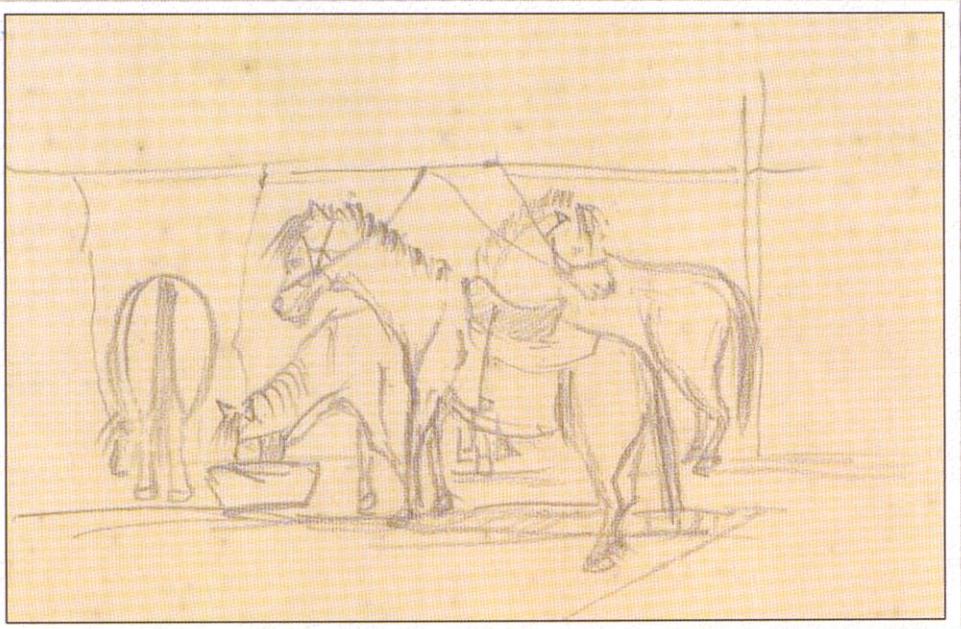
南京大学一角

(责任编辑:韦俊)



1943年5月14日侯光炯在兰州考察时的画作

侯光炯画作



侯光炯作骏马图

(目前西南大学档案馆已收集到侯老画作十余幅，多为他沿途考察闲暇时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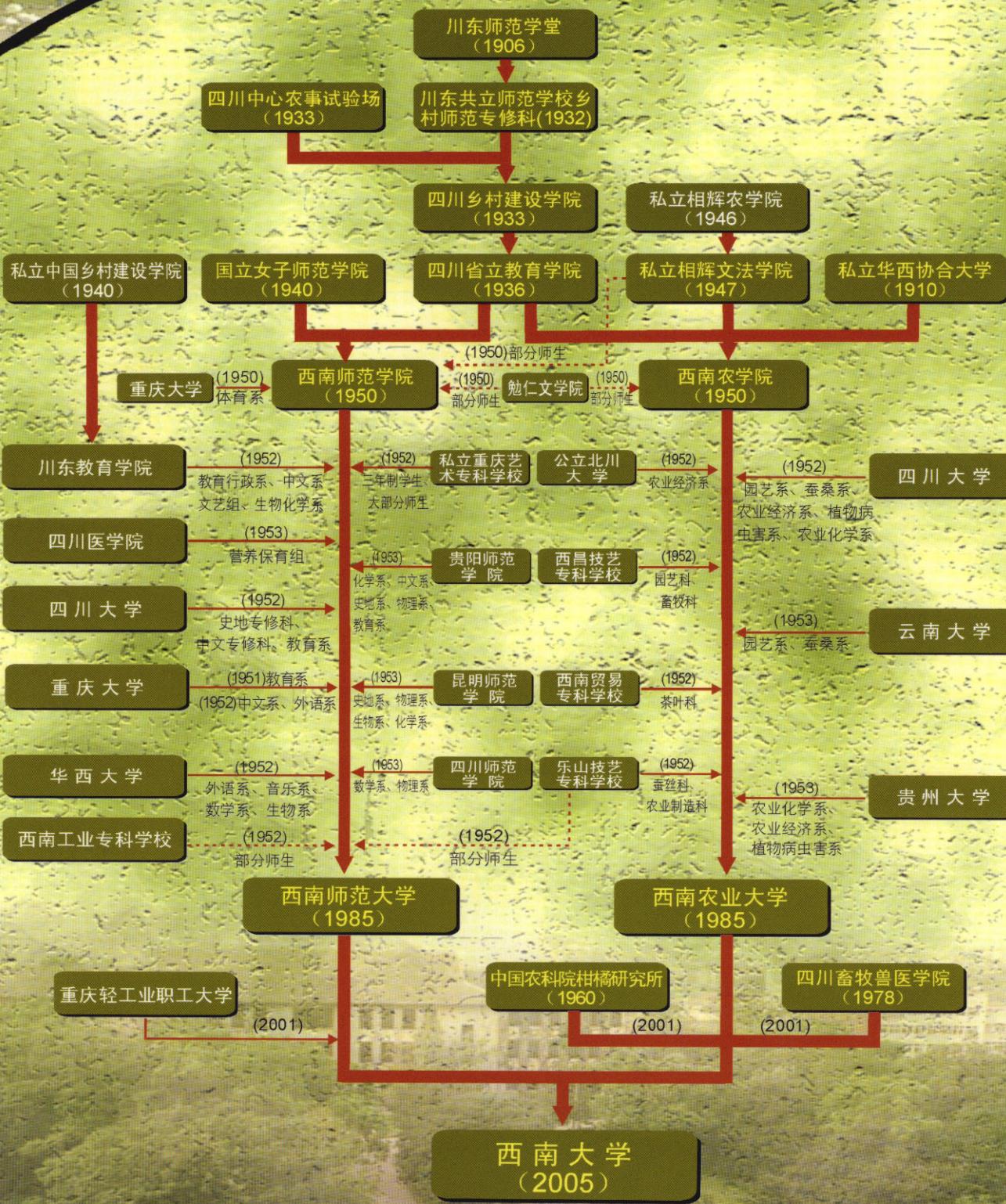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



沿革

LISHI

YANGE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